

研究論文

台灣族群不平等的再探討： 解釋本省 / 外省族群差異的縮減

蘇國賢 喻維欣

蘇國賢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khsu@ntu.edu.tw)、喻維欣 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whyu@mail.utexas.edu)。本文初稿曾發表於2004年台灣社會學年會。特別感謝本刊編輯委員會、兩位匿名審稿人、和中研院社會所王甫昌給予本文的修改建議，以及李珮琳在資料整理與校稿上的協助。

收稿日期：2005/9/20，接受刊登：2007/12/14。

中文摘要

戰後外省大量移民改變了台灣人口結構，使台灣頓時成爲多元族群的社會。過去文獻指出，儘管族群差異逐漸縮減，本省人的社會經濟地位仍較外省人爲低。有些學者提出政治排外的論述來解釋族群不平等，另有學者從家庭背景（如父母社經地位與父母教育程度、語言文化等）來討論影響不平等再製的因素。本文首先運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匯整資料來分析外省與本省族群在教育年數與初職職業聲望上的長期趨勢，發現兩者差異急速縮減。由此引出本文的問題：「何以外省人作爲一個優勢外來移民，無法持續其優勢地位？」奠基於蔡淑鈴等國內學者在族群不平等的先驅研究，本文試圖提出一個本省／外省差異縮減的可能解釋架構。從「79年戶口及住宅普查」資料的分析中，我們發現外省人有集中在公部門的情形，且外省人就讀文組或從事語言媒體相關職業的比例偏高。我們進一步運用「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針對中學生的認知能力進行分析，推論語言能力在聯考中的相對比較優勢及職業文化上的親近性，可能是導致外省人就讀文科或從事文職比例偏高的原因。這些實證發現指出，外省人移民初期在職業上的類聚與分佈，對於其後代的志向選擇及市場競爭能力有長遠的影響；由於語言上的比較優勢、文化上的親近性、及職業類聚的影響，導致外省人比較可能任職於公部門等較難累積「創租資本」、且不易透過代間移轉來繼承優勢的職業。這種在機會結構及競爭場域中的差異性人口分佈，可能是導致外省與本省族群社經地位迅速平等化甚至逆轉的重要結構性因素。

關鍵詞：族群不平等、族群類聚、文化資本

**When Social Reproduction Fails:
Explaining the Decreasing Ethnic Gap in Taiwan**

Kuo-Hsien S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ei-Hsin Y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Abstract

The postwar influx of 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Mainlanders”—rapidly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ethnic diversity in Taiwan. Previous research comparing their socioeconomic attainments with those of native Taiwanese—“Islanders”—has consistently identified the first group’s advantages. However, such ethnic differences have apparently decreased over time. Factors commonly used to explain Taiwan’s ethnic inequality generally fail to account for the Mainlanders’ inability to reproduce their socioeconomic advantages across generations.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the question of why ethnic gaps in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have narrowed or closed over time. Using TSCS data collected over several years, we first demonstrate how the two groups have converged in terms of years of education and first occupation status. Next, we use the population census to examine ethnic segregation by college major and occupation, and report that Mainlanders are more likely than Islanders to major in the humanities. Our analysis of a separate set of TEPS data suggests that this is a result of the Mainlanders’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language skills. Consistent with their choice of

major, Mainlanders are also less likely to hold jobs that are conducive to “rent-generating” assets. We therefore argue that the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affinity, plus the higher concentration of public sector workers among early generation Mainlanders living on Taiwan, have all affected their descendents’ strategies for both educational and commercial success. As an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by ethnicity has accelerated the equalization process, thereby accounting for (at least in part) the convergence and possible reversal of trends in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inequalities.

Keywords: Ethnic inequality, ethnic homophily, cultural capital

一、導論

社會當中是否存有不平等的狀態，與不平等是否得以「再製」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一個社會中存有族群不平等的現象，表示各族群在普遍認為有價值的資源及機會上，有分配不均的情形之外，也代表此社會能透過某種控制機制「再製」（reproduction）這種分配的差異，使之以固定的結構持續存在（sustained）（Sorensen 2001）。族群不平等的論述如果要有紮實的經驗基礎，除了必須勾勒出族群不平等的分佈情況及發展過程，更重要的是能解釋它之所以存在及維繫的理由。國共內戰之後來台的外省移民中，有高比例政府官員、民意代表、知識份子等教育程度較高的各省菁英，使得台灣在光復初期，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社會經濟背景及教育程度產生明顯的差異。這是大量移民所造成的歷史偶然，並非任何外在支配力量刻意設計及控制的結果。重要的問題是，作為一個「移民優勢階級」（migrant superordinate, 見Liebersohn 1961），外省人是否透過任何刻意或不刻意的設計來維繫其自身的優勢地位？

過去台灣已有很多實證研究描述族群不平等的情況，學者也試圖提出解釋這些不平等的架構（Chen and Lin 2004; Jao and Mckeever, 2006; Tsai and Chiu 1993; 王甫昌 2003; 吳乃德 1997; 林忠正、林鶴玲 1993; 蔡淑鈴 2001; 駱明慶 2001）。本文奠基於前人所提出的理論與實證，先以資料來呈現本省／外省差異的長期縮減趨勢，然後從「為何族群不平等無法再製？」這一問題出發，試圖透過社會資本、語言文化資本、及實體資本等面向的討論，提出一個解釋不平等無法再製的理論架構。本文認為早期外省人的職業分佈，與國家語言政策所形成的語言親近性，對於其後代子女科系與職業選擇的影響，是間接造成族群差異縮減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 不平等的再製：Turner的古典社會流動模型

與社會流動有關的古典理論模型，最有名的莫過於Turner（1960）所提出「競賽流動」（contest mobility）與「薦舉流動」（sponsored mobility）兩種社會流動的原型。在「競賽流動」的原型中，所有地位皆透過個人的努力、從公開競賽中取得。地位取得的標準，為大眾所認可、且容易辨識的憑證（credentials），權貴階級無法左右競賽的結果。反之，在「薦舉流動」中，向上流動必須先取得既有菁英會員的「推薦」，然後由全體會員根據候選人是否具備會員特質來「遴選」未來菁英。流動不是個人憑努力而贏得的地位，而是「甄選」的結果。地位的取得，是根據表面上客觀、但實際上無法透過努力取得的「憑證」。這種憑證須得到既有菁英相互認可，且需經過特殊長期的養成訓練才能辨識，如生活品味、文學素養、藝術欣賞能力等。這種「會員認證制度」阻斷了一般人晉升菁英地位的管道，使得菁英階層可以穩固地再製會員。因此，在薦舉制度之下，菁英階級必須透過社會資本及文化資本的同時運作，才能有效地維繫其支配階級的優勢地位。

一個支配團體要維繫其優勢地位，除了要能控制資源的分配與保障其會員的再製與傳承，更重要的是要有能力界定價值體系及灌輸合理化不平等的意識型態（Schermerhorn 1970: 12-13）。無論一個社會向上流動的規範傾向於「競賽流動」還是「薦舉流動」，不平等的結構必須具有某種「正當性」才能持續存在。維繫不平等狀態的最大的問題在於如何確保劣勢階級及「輸家」對不平等的體制，仍能保持一定程度的認同，使其能安於劣勢地位的現實。學校教育被認為是「正當化」不同流動規範價值最重要的機構（Bowles and Gintis 1976; Turner 1960）。

在競賽流動的規範下，個人在教育過程中被教導去追求美好未來的

憧憬及力求上進的規範。社會努力維持競賽的公平性，並盡量遞延最後的「總決賽」，讓每一位參賽者都盡量能有「敗部復活」的機會。一直等到參賽者過度投入才公佈輸贏的殘酷現實。因此在比賽終了之前的長期競賽過程中，每位參賽者對未來都抱持高度的期待。由於每一個人皆被鼓勵在體制內去爭取地位，在準備競賽的過程中，自然培養出對於體制的忠誠。透過大眾媒體對於「向上流動」之成功典範的塑造與宣傳，也使每一個人對未來充滿了憧憬，這種未來的成功意象縮短了權貴菁英及一般人的心理距離，進一步強化了一般人對於體制的認同感（Turner 1960）。

理想上，在以競賽流動為主的社會中，教育的目的是盡可能地訓練所有的人都具備成為菁英所需的技能與品格，使所有人都有機會贏得最終的大獎。可惜的是，個別參賽者加入賽局時的初始條件（initial endowments）並不相同，因此每一個人所面對的輸贏機率並不是一個常數。如果這個初始條件可以透過出身賦予過程（ascriptive process）轉移給下一代，則優勢階級可以透過代間移轉（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來再製不平等。在競賽流動的價值規範下，學校設立的目的之一，本來是為了消彌因初始條件的差異所造成的競賽不公現象；但教育社會學的理论與實證研究都指出，學校的體制不但無法消彌初始條件的不平等，且經常進一步的強化原有的不平等結構（Bowles and Gintis 1976; Entwisle, Alexander and Olson 1997）。因此，在表面公平的競賽流動之下，優勢階級可以透過社會經濟地位等初始條件的優勢再製下一代的人力資本，使得不平等的結構得以維繫與再製。

在薦舉流動的規範中，支配階級不僅以經濟權力與政治壓制達成階級控制的目的，而更進一步透過符號的控制，強制他人接受符合支配階級利益的世界觀，來進行再製工作（Bourdieu 1973）。在薦舉制度之

下，選拔通常在早期的教育階段即開始進行，目的在及早區分出「值得培養」（promising）與較不具競爭力者。一方面可有較充裕的時間訓練入選者取得不易被模仿的「憑證」，以強化一般人與精英階層能力相異的認知（Bourdieu 1973; Cookson and Persell 1985; Turner 1960），另一方面也可以及早對「落選者」進行「再社會化」，教導其接受「資質較差」或「努力不足」的自我認知，並依此自我認知去規劃未來，避免大多數人對自己有過高的期待，致使日後產生不滿（Turner 1960）。教育的目標是一方面灌輸菁英文化與身份認同給予一小撮未來準備要進入菁英階層的「選民」，同時也透過灌輸被支配者「安分守己」的順民觀念，以維繫其對於體制的忠誠。

（二）影響不平等再製的三種資本

過去研究指出族群的相對優勢，部分取決於各族群在教育及地位取得上的差異（Jencks 1972）。因此解釋族群的不平等大多從解釋族群的成就差異開始。族群在學業及地位成就上的差異，可以源自三種不同的因素：父母對於子女人力資本的投資、父母可以傳遞給學童學習所需的文化資本、及有助於人力資本及文化資本累積及發揮的社會資本。

過去實證文獻指出，父母的收入及教育程度，是影響子女學業表現最重要的因素（Kao and Thompson 2003）。透過父母對於兒女的人力資本投資，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家庭可以再製下一代的優勢人力資本，使其在競賽中保持優勢的地位。以社會經濟地位再製來解釋族群差異的論述，必須要能進一步解釋：為何族群地位與社會經濟地位會高度相關？族群本身是否有獨立於社會經濟背景之外的「淨」影響？

文化資本經常被視為是再製族群不平等的重要媒介。文化資本是個

人從其家庭所承繼的生活形態、思維模式、與氣質品味等語言文化之相關能力，包含直接與學習相關的認知能力（如語言、閱讀能力等），及間接影響學習的非認知能力（如人際技能、習性、組織能力、及專心與紀律等）。除了影響認知能力外，文化資本也影響性向及志向的選擇（DiMaggio 1982），並被用來作為一種區別階級身份的符號。這些能力、志向、及身份區別，共同影響地位的取得。Bourdieu（1973）認為透過教育強化文化資本的差異，是再製社會不平等的最重要體制。他認為學校的學習環境基本上是反映中、上階層的文化價值觀。社會經濟背景較佳的孩童，在家庭的社會化過程中所習得的文化資源，讓他們在學校有較強的適應力及學習能力，其文化資源因此轉變成一種具有競爭優勢的文化資本。

在台灣的社會脈絡中，欣賞文學、藝術、戲劇、音樂會等文化活動並不具有階級專屬性，具備解讀精緻文化符碼的能力並不等於擁有專有化的工具，因此文化資本不容易成為區別階級身份的訊號。儘管如此，文化資本仍有可能透過影響能力、性向與志向，來作為傳遞階級身份的媒介。在本土脈絡中比較重要的問題是：在特殊的語言及文化政策的歷史脈絡之下，各族群間是否有明顯的語言與文化能力的區隔？這種文化資本的差異是否影響人力資本或社會資本的取得？語言文化上的優勢是否可以透過代間移轉傳遞給下一代？

社會資本是決定人力資本與文化資本能否快速累積及充分發揮的重要影響因素（Burt 1992; Lin 2001）。在同樣的人力資本水準下，透過社會關係能取得較佳機會，間接產生較高的報酬率。移民研究指出，族群資源對於新移民而言是一種十分重要的社會資本（Light and Bonacich 1988; Logan, Alba and McNulty 1994; Tseng 1997; 曾嬾芬 1997）。由此類研究類推，我們提出下列問題：戰後外省人大量移入的特殊移民歷

程，是否使得族群透過地理空間與社會空間的群聚，形成一種特定的族群社會資本，間接影響各族群間的競爭優勢與相對機會？

（三）重新檢視三種資本與再製不平等的關係

族群不平等的問題，是本土學者最關心的議題之一。部分學者將論述焦點置於政治上的排外政策，包含語言政策（Chen and Lin 2004; Tsai 2005；蔡淑鈴 2001）、國家福利津貼政策（吳乃德 1997）、及公職人員的限額等政治上的操弄所形成的族群不平等。

除了以政治排外來解釋族群不平等外，有些學者以「透過社經背景所產生的人力資本再製」作為解釋台灣族群不平等的重要命題（Jao and McKeever 2006；陳婉琪 2005；駱明慶 2001）。這些研究指出，外省父母的教育程度與社會經濟地位較高，是造成其子女的教育及職業地位較高的「原因」。但對於何以具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外省族群，無法持續維繫其階級的優勢卻沒有提出一致的看法。過去研究主要是以描述族群不平等的狀態為焦點，比較忽略不平等能否持續、再製的問題。本文擬從人力資本、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作為再製機制的可能性，提出一個族群差異縮減的解釋架構。

1. 理性決策與人力資本的再製（Rational action and socioeconomic reproduction of human capital）

族群不平等的討論，可以分別從宏觀的體制／脈絡環境（institutional factor/contextual effects）及微觀（micro）的視角切入。從宏觀體制觀點出發，美國的研究顯示族群的不平等與經濟、教育、與政治體制上的歧視有關。例如少數族群通常因為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無力負擔昂貴的高等教育學費，而被迫較早中斷教育，進入勞動市場；窮父母因

為教育程度較低，生活壓力較大、工作較忙，導致家中人力不足而無法在學業上及教養上提供子女較多的幫助；貧民區的教育資源稀少，導致教育品質較低落、同儕與老師的教育動機與期望較低、學校教學與教育受到學生偏差行為干擾較為嚴重等問題（Breen and Jonsson 2005）。這些解釋族群不平等的一般體制性因素，僅能部分解釋台灣的狀況。台灣有其特殊的歷史發展脈絡須要額外考量。首先，相對於歐美較為複雜的階級結構，台灣在戰前的社會結構，主要是以農民為主，因此家庭背景差異不大。農家子弟的高流動率，為台灣社會流動的特色之一（蔡瑞明 1997：1999）。其次，台灣在戰後教育機構的品質差異不大，因此早期世代所面對的教育機會結構並沒有明顯的差異。由於教育的急速擴張，父母親的教育程度一般都比子女低，因此父母的人力資本對於子女的直接影響也有限，加上聯考制度與國家考試的普及，篩選機制並沒特別偏好高社會經濟背景子女的理由。因此，社會經濟地位再製的機制，應該與歐美社會十分不同；西方社會經濟地位再製的理論架構，無法全盤適用於台灣。

微觀的階層化理論在過去十年也蓬勃發展。理性行動理論（rational action theory）（Breen and Goldthorpe 1997）認為父母的人力資本、文化資本、教育動機、及職業偏好，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子女的教育決策。在面對各種教育決策如「是否繼續升學？」「就讀哪種科系？」等問題時，決策者會同時考量各種決策的期望效益、成本、及成功機率。由於每個家庭的資源不同，且每一位學生在各方面的能力也有差異，因此每一個決策者對於成本效益與成功機率的評估皆不同（De Graaf, De Graaf and Kraaykamp 2000）。例如高中畢業生面臨升學的決策時，可能必須將「家庭是否有能力供給就學？」「就讀哪一種科系？」「考上各類學校及科系的機率為何？」「該科系將來的就業前景好不好？」等問

題都納入決策的公式當中。

在台灣的社會脈絡下，哪些因素會影響教育的理性決策過程呢？從微觀模型來討論教育不平等問題，家庭資源分配策略的相關研究指出，體制因素與微觀決策之間具有密切的關係，不應該分開處理。例如，蔡淑鈴（2001）的研究指出，父母對於不同性別子女的教育期望，與一個社會的性別分工、性別規範有緊密的關連。林鶴玲等的研究也顯示，不同族群在就業型態上的分佈，會影響父母對於子女教育投資的態度（Lin 1998；林鶴玲和李香潔 1999）。也就是說，體制因素會影響理性決策模型中對成本效益及成功機率的評估，因此不應該被視為是外生變數（Erikson and Jonsson 1996）。Xie and Goyetteb（2003）在一篇解釋亞裔移民社會流動的研究中，提出了「策略性調適」（strategic adaptation）的模型，這個模型指出，移民對於未來職業的期望，會影響其對於教育的期望，進而影響教育與職業地位的取得。而一個族群對於職業的期望，與該族群在勞動市場中的相對機會與侷限有很大的關連。本文承襲這個觀點，從早期外省人在科系及職業的分佈，來推論就業與就學的理性決策，對於各種資本的代間移轉及地位繼承可能產生的長遠影響。

2. 語言與族群特定文化資本

第二個值得進一步探究的問題，為文化資本所扮演的角色。這可以進一步分成與人力資本較為相關的「語言」能力，及獨立於語言能力之外的「文化」影響。台灣的歷史情境比較特殊之處，是少數後來的移民以其優勢的政治力量，推行大多數「先移民」的本省人並不熟悉的北京話成為通用的「國語」。國民政府遷台後，政府對於已經離開學校的人，除了透過宣導與推行國語之外，並沒有一個強制的語言政策，造成本省與外省人在使用官方語言能力上的差異。蔡淑鈴（2001）的研究指出

國語流利，「是閩南人向上流動必備的另一項基本要件」。不同族群在國語使用能力上的差異，可能是造成族群背景影響教育與職業地位取得的因素之一（蔡淑鈴 2004）。

我們延續蔡淑鈴的研究，進一步分析語言與族群地位差異之間的關係。語言資本的論述，至今未能釐清語言資本的影響，究竟是來自於語言本身作為一種人力資本的技能，還是語言在職場或學校中，被當作特定族群篩選「會員」的文化資本訊號？本文將透過實證資料的分析，結合理性行動理論及策略性調適的觀點，來說明語言資本在台灣既沒有形成技能的區隔，也沒有被當成階級篩選的訊號，而是透過影響外省子女職業及科系選擇，對於族群不平等的縮減產生不預期的影響。

3. 族群類聚與族群社會資本（Ethnic homophily and social capital）

以族群社會資本做為再製族群不平等的論述，首先要問的問題是，在經濟生活領域中是否有族群類聚的現象？這種類聚如何影響各族群的相對地位？Lieberson（1961）指出維繫一個移民統治（migrant superordination）的前提，是必須在社會互動及會員再製上，產生某種程度的封閉性（closure）與排他性（exclusion）。族群經濟研究（ethnic economy/ethnic enclaves）（Portes and Manning 1986）、移民研究中的「區別同化理論」（segmented assimilation theory）（Portes and Zhou 1993）、及分割勞動市場（split labor market）（Bonacich 1972; Bonacich 1976; Wilson 2003; Wilson 1978）等族群相關的研究也都指出，族群的類聚（ethnic homophily）與族群不平等有密切的關連。例如族群經濟的研究指出，移民在主流勞動市場中遭受排擠，往往容易產生職業的群聚及高比例的自雇人口（Logan, Alba and McNulty 1994; Portes and Manning 1986）。曾熾芬（Tseng 1997；曾熾芬 1997）的研究指出，透過族群特定的社會資本所產生的集體資源，為影響移民創業的重要因

子。

由於本省人與外省人除了語言之外，沒有清楚的社會定義（social definition）與明顯界線，是否在族群互動上產生隔閡，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王甫昌 2002a；2002b）。因為人口比例的懸殊，外省人與本省人在跨族群接觸上原本就有很大的差異。McPherson等人（McPherson, Smith-Lovin and Cook 2001）認為討論族群類聚時，應該要區分因為人口比例及接觸機會差異所形成的「自然類聚」（baseline homophily），以及超過自然接觸機會所形成的「內生類聚」（inbreeding homophily）。國內學者已開始注意跨族群互動的研究（王甫昌 2002a；陳東升、陳端容 2002；陳端容、陳東升 2001），但目前還沒有充分的證據顯示外省人有超越基準類聚的內聚現象。更重要的是，國內學者對於族群類聚如何影響社會流動與經濟機會，也沒有提出特定的理論模型。

最近的階層化研究指出，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中，不平等的創造與維繫，主要是透過市場運作來進行。一個支配團體的優勢地位，必須能轉化成某種市場力量（market power），才能穩固地維繫其優勢（Roemer 1982; Sorensen 2001）。在市場中，一個族群必須擁有能產生經濟租（economic rent）的資才（rent-generating assets）¹，或位居能產生經濟租的職位（employment position），才能再製階級優勢。蘊含經濟租的資才，包含能快速創造及累積財富的各種實體資才如組織地位、金融投資、企業經營、土地擁有、與非實體的人力資本如工作技能、創新力、與企業家精神等。人力資本主要是透過學校教育、與勞動市場中的工作經驗、及組織的在職訓練等來累積。而實體資才的累積，主要是

¹ 由於assets中包含資產與才能，我們用「資才」而不用「資財」一詞，以涵蓋更廣泛的範圍。

透過勞動市場、產品市場、與金融市場中的超額報酬的累積，及透過「再生產」的投資增長所致。除此之外，各族群在不同經濟領域中的社會資本分佈，是決定人力資本與實體資才能否發揮功效的重要因子。我們將這些資本統稱為「創租資本」。在台灣社會中，這些創租資本在各族群中的分佈狀況為何？這種資本不平均的分佈，是否影響各族群在市場競爭中的相對地位？更重要的問題是，這些資本或職位能否透過代間移轉（intergeneration transfer）傳給下一代？

族群在產業及職業上的類聚，除了影響資源的取得外，也影響使用這些資源的機會（Logan and Alba 1999; Wilson 2003）。各族群在行、職業的分佈，與創租資本的取得與累積有密切的關連。戰後遷台的外省菁英，由於國民黨統治上的需求，大量進入行政部門，司法體系、軍職系統、媒體及教育專業、以及具有壟斷效益的事業如郵政、交通通訊、水電等重要民生相關的公營部門中。因此光復初期，確實有外省人較為集中於部分行、職業的情形。外省人若在某些行、職業（如軍公教）有過高的比例（overrepresentation），基於總人數的限制，在其他領域必然也有比例過低的情形（underrepresentation）。這些行職業集中與缺席的不均勻分佈，對於外省人的流動產生何種影響？本文認為外省人初期在職業上的聚集現象，與其是否能再製支配階級地位有密切的關連。不同於過去政治排外的論述，我們嘗試在本文中指出，外省人在軍公教的集中，影響其在「創租資本」上的取得與累積。本文將透過外省人在職業上的分佈，來討論族群類聚對於其在勞動市場及產業中的競爭所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

過去的族群研究，比較忽略族群建構的動態過程，經常以橫斷面的資料來論述族群不平等。本文認為族群是一個正在進行中的社會建構，其主、客觀的意義及外顯的影響會隨時代而變化，只有透過長期趨勢的

分析，才能正確論述族群不平等是否存在的問題。我們從簡單的基本問題出發，先討論族群除了作為政治動員的明顯標記外，有沒有獨立於社會經濟背景的其他影響。這些影響是否足以形成一種維繫族群優勢地位的力量？本文將從資料分析中，逐步凸顯本土的「族群議題」，不能以簡單的「政治排外」（exclusionism）或「階級模型」來理解，必須回歸到台灣經濟及社會發展脈絡中，篩選與分配機制的變化如何影響個人的教育投資決策及市場競爭，來重新檢視族群所造成的影響。在下一節中，我們將提出三組假設來檢驗族群不平等的長期趨勢，及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再製的可能。最後，我們將討論外省人初期集中在軍公教及語言相關職業對其子女的科系與職業選擇所產生的長遠影響，並加入移民研究的「策略性調適」模型、教育社會學的理性決策的論述、及創租資才的概念，提出一個族群差異縮減的可能解釋架構。

二、假設

（一）族群不平等的長期趨勢

由於光復初期本省人與外省新移民在教育程度及職業地位上有頗大的落差，造成社會經濟地位不平等的現象。本文的第一組假設檢驗族群在教育與職業地位上的差異，是否維持一個穩定的狀態？如果外省人藉由政治上的支配地位，成功地以類似薦舉流動的模式來維繫其優勢，則我們將觀察到族群的差異不會隨世代縮減。如果族群間的競爭依循競賽流動的原則，由於父母的教育程度與社會經濟地位對於子女的學業及職業成就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族群在教育及職業地位上的差異會持續一段時間；但若缺乏其他再製機制，這種差異將會隨時間而有明顯縮

小的趨勢。

假設一：外省人與本省人的教育與職業地位差異，有隨世代下降的趨勢。

(二) 族群再製的社會資本論述

本文的第二組假設試圖說明，外省人並沒有在學校及職場中，形成類似薦舉流動的優勢。語言及文化的親近性，會影響族群成員間的互動，間接影響族群社會資本的形成與累積。依循薦舉流動的邏輯，族群特定社會資本可以讓居於優勢地位的族群，透過晉用與選拔上的「同質再生」(homosocial reproduction)來繁衍(Kanter 1977)，使得族群的不平等得以再製。從族群經濟(ethnic economy)的角度來思考，族群在職業上的類聚，也可能形成具有排他性的封閉團體來壟斷特定資源。我們分別從學校及職場來考量族群社會資本可能運作的空間。

1. 高比例的外省教師所形成的族群特定社會資本

過去的研究指出，教師可以透過公教人員的特殊待遇，以家庭社經地位的優勢再製下一代的教育成就。除此之外，高比例的外省教師也可以透過類似薦舉流動的機制，使其子女在教育競爭上占有優勢；第一、族群背景及文化資本上的相似性，可能會影響外省父母對於學校參與及和老師的互動關係，間接影響學生學業成就(Coleman 1966; Lareau 1987)。第二、因為族群背景的親近性，也可能使老師對於同族群背景的學童表現評價較高。第三、高比例的外省教師也有助於發揮教育的「正當性」功能(the legitimating function of education)。高比例的外省教師除了在考試徵選上可以偏惠同背景成員之外，也可輔助灌輸主流支

配意識型態，穩定不平等的體系。

雖然我們無法以直接證據來檢驗上述族群社會資本的可能運作空間，但一個間接而簡單的證據，來自於此論述成立的必要條件（前提），即從事教職的外省人必須超過其人口的比例甚多，才能產生類似薦舉流動的優勢。因此從外省人從事教職的人數比例變化，可以間接論述在學校中的族群社會資本，對於維繫族群優勢可能產生的影響。光復初期因為推行國語，對於外省教師的需求甚大，因此早期外省人擔任教師的比例應比本省人高出甚多。但隨著教育的擴張與普及所帶來的師資需求，大量吸引本省人進入中、小學擔任教職，我們因此認為本省／外省的師資比例將逐漸拉近。

假設二（A）：早期由於教育程度的差異，外省人擔任教師的比例偏高，但集中的情形有隨世代下降的趨勢。

2. 職場上的集中所產生的族群特定社會資本

另一個族群社會資本可能發揮效用的地方，在於職場上的類聚所產生的優勢。這可以進一步分成兩種不同的論述：一為公教部門中的特殊待遇，另一論述則強調族群的職業類聚在私部門所形成的類似薦舉流動的優勢。

由於光復初期大量的國民政府人員遷移來台，造成公部門當中有高比例的外省人（吳乃德 1997；林忠正、林鶴玲 1993；蔡淑鈴 2001）。吳乃德（1997）指出，外省人因為政府對於公教人員的教育補貼，間接地降低了教育的投資成本，使得外省人具有較高的教育程度及社會經濟地位。我們認為這種因特殊歷史脈絡所產生的短暫優勢，無法成為族群再製的主要機制。除了少數媒體產業外，公部門大都必須通過國家考試

取得就業資格。由於公教子女無法直接繼承公教身份，很難透過世代間的移轉來再製「會員」；因此我們預期公教部門中的外省人比例會隨著教育差異的縮減而逐年下降。此外，急劇的經濟成長也會使公教部門的津貼補助優勢逐漸消失。因此公教身份對於子女的教育與職業地位的影響，可能僅限於戰後在台灣成長的第一代，長期來看，公教背景將不會有顯著、穩定的影響。

假設二（B）：早期公教部門中外省人的比例偏高，但集中的情形有隨世代下降的趨勢。

假設二（C）：長期來看，父母親的公教背景對於子女的教育與職業地位取得沒有顯著的影響。

第二種族群在職場上的集中可能產生的影響，來自於特定族群在私部門中，位居重要的決策地位，而形成準階級似的企業菁英圈。依循薦舉流動的邏輯，優勢族群在招募或晉用新成員時，可以透過族群背景的篩選，形成特殊的職場區隔。Kanter（1977）針對大型企業內部的研究指出，經理人會傾向於招募與自己背景相似的員工，產生同質再生的現象。對於企業主管及董事會的研究也指出，企業菁英是一群十分封閉的「圈內」（inner circle）特殊階級（Useem 1984）。依循這個邏輯，如果外省人要形成一經濟優勢階級，先決條件是必須在各行各業中佔居重要決策層級的位置，才能透過薦舉徵選來提拔外省人才。在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體、從農業快速轉向工業的經濟體制中，雇主及自雇身份為兩個比較具有支配的位置。來台初期，由於大量外省人集中在軍、公、教、媒體、及壟斷性公營事業等大型組織中，基於相對人數的限制，可能無法同時在私部門中也形成對等的支配力量。因此我們預期外省人擔

任雇主與自雇的比例，與本省人沒有太大差異。

假設二（D）：外省人與本省人擔任雇主及自雇的比例沒有顯著的差異。

（三）族群再製的文化資本論述

本文的第三組假設試圖說明，沒有證據顯示外省人可以透過文化語言所產生的文化資本優勢來維繫其地位。如前所述，族群特定文化資本的論述，應進一步區分「語言」與「文化」所產生的不同影響。由於學校教育普遍使用國語，國語的流利度會直接影響學習與表達能力，造成不同族群背景的學生，在學習表現上的差異。如果族群背景在教育取得上的優勢，僅是因為國語流利程度的差異所致，則控制國語流利程度後，不同族群的學生在認知能力表現上的差異應會消失。如果族群特定的文化資本對於認知能力有獨立於語言資本的影響，則在控制國語流利程度之後，父母的籍貫對認知能力的表現應仍有顯著影響。

語言文化的熟悉度，也影響吸收主宰文化（dominant culture）的能力與速度。如果接收主流文化的能力僅能在透過家庭教育所灌輸的族群特定文化中培養，且對於主流文化的不同熟悉度會間接影響教育學習成效，則族群可以透過文化資本的傳遞來再製教育上的優勢地位。假設「族群特定文化資本」具有影響力，則族群背景對於認知能力的影響，應與族群背景的「純」度相關，即父母同為外省人的族群特定文化資本要高於僅有父或母為外省人的家庭及父母雙方皆非外省人的家庭。反之，族群背景對於學習成效的影響，也可能是族群背景與社會經濟地位高度相關所產生的虛假效果。如果族群背景所產生的效果，反映的並

非族群特定的文化資本，而是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則在控制父母親的社會經濟背景與教育程度後，父母籍貫對於認知能力將不會有特別的影響。我們便可據此排除以文化資本做為一種再製機制的論述。

假設三：控制本人的國語流利程度及父母社經背景與教育程度後，外省背景對於一般認知能力沒有獨立的影響。

(四) 策略性的調適與科系職業的集中

在假設二與假設三分別檢驗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做為族群再製機制的可能之後，本文以最後一組假設來提出另一種替代的解釋架構，即初期的職業集中與語言的親近性，影響外省人在科系與職業上的選擇，進而造成族群差異縮減的不預期結果。首先我們認為外省背景的文化資本優勢，僅侷限於語言相關科目，而非對所有科目的學習都會產生相同的效果。

假設四 (A)：外省背景僅影響語言相關的學業能力，但不會影響數學分析能力的表現。

其次，根據「理性行動理論」與「策略性調適」的論述邏輯，這種語言上的相對優勢，可能透過以下幾個理由來影響科系與職業志向的選擇：第一、由於語言文化的親近性，使得外省人對於語言相關的學科與職業較容易產生興趣。第二、如果外省族群在語言相關學科的表現較佳，基於考試的比較優勢考量，會有較多人報考語言科目比重較大的文法科系。在語言及文化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外省學童，可以透過這些特定

科目，在升學競爭上產生相對優勢。另外學生一般對於自己較拿手的科目比較容易產生興趣，因此透過成績來影響性向，也會使得較多外省學生選讀語文相關學科。第三、父母職業對於兒女的性向也可能產生深遠的影響。初期來台的外省人，因為官方用語的親近性，擔任文職或語言相關的職業比例較高，透過影響其下一代的志向選擇，也會造成外省人集中在語言相關科系及職業的現象。

假設四（B）：外省人比較容易選讀與語言相關的科系。

假設四（C）：外省人比較容易從事語言相關的職業。

三、研究方法

（一）資料與樣本

討論族群的不平等，理想上應該以長期追蹤資料來進行分析。由於目前國內沒有包含完整教育史及工作史的長期追蹤資料，我們彙整三個大型資料庫，從不同世代的比較，來進行社會變遷的推論。我們首先彙整民國79年至91年之「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共11期的資料，來檢驗族群差異的長期趨勢。排除缺乏父親職業的資料，共有35,043筆資料可供分析。此資料主要涵蓋民國73年以前出生的世代。

本文所使用的第二個資料是「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簡稱TEPS）。這是國內目前唯一具認知能力測驗分數的資料。本研究以第一波調查的11,770位國中樣本及11,787高中職五專樣本來進行分析，代表民國76以後出生的世代。

最後本文採用民國79年的人口普查資料來進行職業分佈與科系選擇

的分析。此普查資料的缺點為它僅包含1970年前出生的世代，無法顯示近幾年的變化；不過這個資料足以告訴我們從1945年以來，橫跨近40年的長期趨勢。

（二）變數測量

假設一的檢定，主要是以「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來進行分析。兩個重要的依變數為受訪者的最高教育年數及初職職業聲望。由於職業聲望會隨著受訪者的職業生涯而變動，為避免其他因素的干擾，我們以受訪者第一次就業的職業聲望作為依變數，以減少模型中的控制變項。初職聲望以Ganzeboom及Treiman兩位學者所發展的「國際職業標準聲望分數」（Standard International Occupational Prestige Scale, SIOPS）來衡量。自變數為出生世代及父親籍貫。出生世代以受訪者的出生年次來衡量，族群分成本省（包含閩南人與客家人）與外省兩個類別。重要控制變數包含本人性別，父親教育年數，及社會經濟地位分數（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 ISEI）。社會經濟分數是按照Ganzeboom等人（Ganzeboom, Graaf and Treiman 1992）所提出的修正方式來計算。

族群在科系與職業上的分佈，是以「79年人口普查」的資料來進行分析。籍貫類別分成本省與外省兩大類。科系別區分成（1）文學藝術；（2）社會科學、法律；（3）商學管理；（4）數理；（5）工學院相關科系；（6）醫學；（7）農學院及生物科學七大類。在職業變項上，普查資料使用中華民國標準職業分類中的三碼職業，共計320種。為了檢驗有關於外省人是否集中在公教部門的假設，本文依照「是否受政府雇用」的回答，並找出任職於各級學校的老師，分出「受雇於政

府」、「任職於私立學校」、及「任職於公立學校」三大類別來進行分析。另外也從雇用身份的問題中算出各族群「雇主」與「自雇」人數的比例，以檢證假設二（D）。

有關族群背景對於認知能力的影響，是以TEPS中所提供的各項認知能力測驗分數（test score）來進行分析。測驗分數代表先天能力（innate ability）與後天學習（learned information）的組合。儘管測驗分數有許多問題，仍然是目前教育社會研究中最重要變數之一（Tam 2004）。認知能力以一般計量心理學（psychometrics）所採用的Item response theory（IRT）來測量。有關IRT測量的方法與效度，請參與楊孟麗等人所提供之心理計量報告（楊孟麗、譚康榮、黃敏雄 2001）。認知能力測驗分為「綜合分析能力」、「一般分析能力」、與「數學分析能力」等三種分數。

影響認知能力的控制變項包含性別、就讀學校之公私立別，學校所在地的城鄉別、及不同的學制分流。主要自變項包含學生本人母語的流利程度（是否流利），由於僅有7.16%的樣本選答「國語不流利」，因此本文將「國語不流利」當作虛擬變項。其他控制變項包含父母親教育程度及全家收入。

過去的族群研究中，一般以父親的籍貫當成族群分類的標準，但這種定義隱含族群的自我認同與外在認知都是以父親的籍貫為準，並沒有理論及實質的根據。本文採用較細緻的分法，將父親的籍貫與母親的籍貫交叉，得出「父閩母閩」、「父閩母客」、「父閩母陸」、「父客母閩」、「父客母客」、「父客母陸」、「父陸母閩」、「父陸母客」、「父陸母陸」九種籍貫的組合。這種詳細的區分，較能正確看出族群背景所產生的影響。

(三) 分析方法

本文以Glenn Firebaugh (1997) 在Analyzing Repeated Surveys一書中所介紹的多次調查 (repeated surveys) 的資料分析方法，來分析籍貫背景對於教育程度與職業聲望影響的長期變化趨勢。我們以迴歸模型中的「族群」與「世代」的交互作用項，來檢驗族群差異的長期變化趨勢 (group difference in trends)。以族群在教育年數差異上的變化為例，檢定模型可簡單表為：

$$\text{教育年數} = \beta_1 + \beta_2 (\text{出生世代}) + \beta_3 (\text{外省}) + \beta_4 (\text{世代} \times \text{外省}) \\ + \sum_j \delta_j (\text{其他控制變項}_j) + e_j$$

其中 β_2 為跨世代的斜率 (cross-cohort slope)，代表各出生世代在教育年數上的平均差異。 β_3 及 β_4 兩個係數的正負符號可以用來檢定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教育程度差異是否有逐年擴大 (divergence) 或逐年縮減 (convergence) 的趨勢；如果 β_3 及 β_4 的正負符號相同，表示差異逐年擴大，如果兩係數的正負符號相反，表示兩族群的差異逐年縮小 (convergence) 或甚至出現高低地位互換的情形 (crossover)。如果 β_3 顯著 β_4 不顯著，表示兩族群間維持穩定的差異 (parallel trends)。

第二部分關於科系選擇與職業集中趨勢的分析，是以人口普查的母體資料來進行，因此沒有統計推論的問題。我們將所有人按照年齡分成不同出生世代。並按照「本籍」及「性別」分成四個族群組：「本省男性」「本省女性」「外省男性」「外省女性」。然後計算每一個世代中，各族群內就讀某科系或從事某種職業的比例。我們將主要的結果以趨勢圖來呈現。我們沿用一般通俗對於世代的用語，以「幾年級生」來

討論世代的變化趨勢。²

我們以一般線性迴歸模型來進行第三部分關於認知能力的分析。我們以robust standard error來估計迴歸模型的標準誤，以調整因為同一個學校之內學生彼此相關所產生的估計誤差。由於IRT的測驗分數是一種用來衡量潛在能力的心理計量方法，其單位尺度並不具有絕對的意義，因此我們僅能比較不同自變數對於IRT分數的相對影響力，但無法確切說明影響係數所代表的實際單位意義。

四、分析結果

(一) 族群的教育程度差異的趨勢分析

究竟外省人與本省人的教育程度有多大的落差？這個落差是否形成一個穩定的結構？表1詳列迴歸分析的結果。由於本研究的主要關懷為族群背景的影響是否隨世代而改變，我們在各模型中皆加入「世代」與

² 以出生世代來分析各族群組在科系及職業分佈的變化趨勢，有幾個問題：第一、各族群的死亡率可能會影響每組世代的代表性。根據Zimmer等人（Zimmer, Martin and Lin 2005）的研究，台灣的外省人的死亡率比本省人低，因此我們將資料限制在民國79年時的歲數介於25歲（民國55年出生世代）與60歲（民國20年出生世代）之間的成年人，以降低因為不同平均餘命所產生的影響。第二、普查資料中與職業相關的變數都是指「79年當時」的職業，在推論時必須將與時間相關的生命週期及勞動市場經驗納入考量。第三、族群在職業上的分佈可能受各族群移民比例高低的影響。如果外省人移民的比例較其他族群為高，則族群差異的世代變化可能必須調整移民的效果。王甫昌在社會學年會中指出外省人的移民比例較高，且移民的外省人社會經濟地位普遍偏高。可惜的是，我們目前找不到任何相關的研究來確認這種說法。

表1 族群背景對教育年數的影響

	全體樣本		男		女		次樣本	
	(1)	(2)	(3)	(4)	(5)	(6)	(7)	(8)
出生年	.165*** (.002)	.185*** (.003)	.161*** (.002)	.188*** (.004)	.245*** (.002)	.260*** (.005)	.203*** (.007)	.203*** (.007)
女性		-4.66*** (.131)					-4.65*** (.207)	-4.65*** (.207)
女性 × 出生年		.075*** (.003)					.075*** (.004)	.075*** (.004)
外省		5.84*** (.184)	4.76*** (.219)	2.07*** (.197)	8.73*** (.342)	3.06*** (.304)	1.88*** (.370)	1.95*** (.373)
外省 × 出生年		-.073*** (.004)	-.054*** (.005)	-.031*** (.004)	-.127*** (.007)	-.052*** (.006)	-.030*** (.008)	-.029*** (.008)
父親教育年數		.605*** (.015)		.599*** (.021)		.610*** (.023)	.640*** (.030)	.642*** (.030)
父親教育 × 出生年		-.007*** (.000)		-.007*** (.000)		-.006*** (.00)	-.008*** (.00)	-.008*** (.00)
社會經濟地位分數		.105*** (.005)		.099*** (.007)		.112*** (.007)	.109*** (.010)	.109*** (.010)
社會經濟指標 × 出生年		-.001*** (.0001)		-.001*** (.0001)		-.001*** (.0002)	-.001*** (.0002)	-.001*** (.0002)
父任職公家機構							.300 (.365)	.346 (.366)
公家機構 × 出生年							.003 (.008)	.003 (.008)
公家機構 × 外省								-.291 (.197)
常數項	3.061*** (.095)	-.853*** (.151)	3.28*** (.10)	-.705*** (.197)	-1.83*** (.10)	-5.81*** (.206)	-1.86*** (.30)	-1.86*** (.30)
N	35043	35043	17700	17700	17343	17343	11509	11509
F	4585	4854	2273	2070	5060	4064	1293	1186
調整R ²	0.395	0.555	0.278	0.45	0.467	0.621	0.553	0.553

註1：* $p < .05$ ** $p < .01$ *** $p < .001$ ，括弧內的數字為標準誤。

註2：模型（7）及（8）的樣本數減少，主要是因為社會變遷調查中，僅有六期的資料有關於父親是否任職公家機關的測量。

各個自變數的交互作用項；因此一個變數的影響，必須同時參考主效果及交互作用項的係數才能正確解讀。從模型（1）與（2）可以看出：愈晚出生的受訪者，教育程度愈高；「女性」的主效果（main effect）為負，但交互作用項為正值，表示在早期世代中，女性教育程度低於男性，但男女教育程度的差距逐年縮小。父親教育與社經地位對於教育有正面的影響，但交互作用項顯示，父親對於子女教育的影響也逐年下降。「外省」有顯著的正效果，而「外省」與「出生年」的交互作用項有顯著的負效果，顯示在早期世代中，外省人的教育程度雖然高於本省人，但本省／外省之間的教育程度差異，有越來越縮小的趨勢。

以模型（1）的結果來推估，其他條件不變，一個民國元年出生的外省人，平均教育程度比本省人多了5.84年；民國20年出生的世代，差距為4.38年；但到民國50年出生的世代時，兩者的差距僅有2.2年；到了民國80年以後出生的世代，「外省」斜率的正負符號則由正轉負。我們將斜率由正值轉成負值的時間點稱為「變換點」（crossover），表示在這個年次以後出生的本省人，其教育程度已不低於外省人。由於早期樣本或是新世代樣本的人數甚少，這些數據的推估有過度延伸預測（Extrapolation）的問題。較有意義的比較是推估樣本人數較多的世代，並在控制父親教育與家庭社經地位之後，來看省籍的「淨」影響。如以模型（2）來推估，變換點約發生在民國63-64年之間，表示在此年之後出生的世代中，具有相同家庭背景的子代，教育年數已經沒有明顯的省籍差異。模型（3）至模型（6）將男女分開分析，整體趨勢大致相同。

人口普查的資料也顯示相同的收斂趨勢（convergence）。圖1（左）顯示各世代教育平均年數的變化，各族群組都明顯地受益於教育的普及。族群之間的教育程度差異也明顯縮小，在民國20年出生的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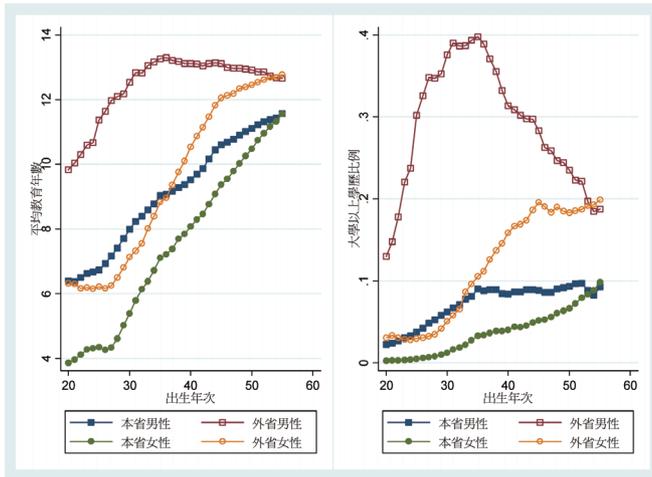


圖1 平均教育年數 (N=9,638,074) 與大學以上學歷比例 (N=757,541) 的長期趨勢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79年臺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

中，外省男性的平均教育程度足足比本省男性多了四年，這與表1模型（1）中，沒有控制家庭背景的4.38年的差異十分接近。到了五年級世代，兩者的差距僅剩一年（本省男性=11.57年，外省男性 = 12.65年）。這與駱明慶（2001）的發現十分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外省男性的平均教育年數在三年級世代之後就一直維持穩定的趨勢。這個結果顯示義務教育的延伸及中等教育的擴張，對於原來教育程度較低的本省人及女性特別有幫助，但對於原本教育程度已經很高的外省男性效益較小。平均教育年數的飽和點，與大學錄取率有密切的關係，大學的錄取率長久以來維持在相當穩定的三分之一以下，直到民國80年代以後才隨大學的擴張陸續增加。因此在大學擴張前

的世代，平均教育年數不易突破高中畢業的程度，而同時期的中等教育擴張，反而使外省男性在升學競賽中增加了更多的競爭者³。這一點與先前研究發現相當一致（蔡淑鈴 2004；駱明慶 2001）。

圖1（右）顯示各族群組大學以上學歷之人口比例，與平均教育年數的趨勢十分相似。比較特別的是，外省男性的大學生比例急速上升與下降的劇烈變化，其分水嶺約為民國38年前後出生的世代，顯示在台出生的外省人，在大學聯考中逐漸面對越來越多本省籍考生的競爭，而無法維持先前世代的優勢。

無論是平均教育年數或是大學生比例的分析都顯示一致的結果，即外省男性在教育上的相對優勢逐漸滑落。因為中等教育的普及，使得越來越多本省人及女性加入聯考的競賽，「分食」了外省男性的入學機會（蔡淑鈴 2004；駱明慶 2001）。這個結果似乎符合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MMI）的理論（Hout, Raftery and Bell 1993；蔡淑鈴 2004），即某一個教育階段已達普及之後，優勢階級的家庭背景優勢將會減弱。另外一個可能的解釋，與來台外省人的階級背景有關；外省男性的大學生比例開始下滑的轉折點為「三年級後段班」，剛好是大量外省人來台的年代，這個時點約略為「是否在台灣出生」的分界點。

「二、三年級」的外省人，大多在尚未成年時，即隨父母移民來台。在戰亂時代，有能力攜家帶眷移民來台的多為外省菁英階級，因此這一個

³ 吳乃德（1997）的研究發現年齡世代對於外省人的教育取得並沒有顯著的影響，以此結果來支持「研究發現世代的差距絲毫沒有影響外省人的教育機會」的說法。這樣的結論忽略了教育的優勢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教育程度的高低應該與世代的平均值來作比較。即使外省人的教育程度沒有變動，其他族群的教育機會變化也會造成其相對優勢的改變。比較正確的解釋是其他族群因為教育擴張受益，而外省人由於教育程度普遍較高，從基礎教育普及所得到的益處不若其他族群。

世代的外省人家世背景普遍較高。在台灣出生的外省籍人士，則包含大陸社會各階層人士及單身來台的軍人所生之後代，社會經濟背景較為混雜，因此教育程度被「平均化」。

綜合教育年數及大專比例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外省人在教育程度上領先的優勢，並沒有長期持續的趨勢，中等教育的普及及聯考制度，拉近了本省／外省在教育程度上的差異。蔡淑鈴的研究也發現，越晚的世代，族群差異越不明顯（蔡淑鈴 2004）。不過在高等教育方面，至少在五年級生之前的世代中，族群的差異仍然十分明顯；其中較為特殊的，是外省女性的教育程度快速上升的現象。MMI雖然可以解釋非外省男性後來居上的情形，不過這個理論難以解釋何以外省女性在高等教育取得上表現特別優異。這與外省女性在文組考試上所具有的比較優勢有關，我們將在結論中進一步討論這個結果的意涵。

（二）初職職業聲望的趨勢分析

表2列出初職職業聲望的迴歸分析。由表中可以看出，控制了家庭背景後，「外省」的主效果，及「外省」與「出生年」的交互作用項皆十分顯著，顯示早期世代外省人的初職聲望高於本省人，但此差距有越來越小的趨勢。

無論是教育年數或職業聲望的分析結果都顯示，族群在控制社會經濟背景之後仍有獨立的影響，但族群的差異隨世代快速的消逝。整體而言，第一代外省移民雖然在教育程度與職業地位上都高於本省人，但這種優勢地位並沒有長期維繫的現象，因此假設一得到支持。

表2 族群背景對初職聲望的影響

	全體樣本		男		女		次樣本	
	(1)	(2)	(3)	(4)	(5)	(6)	(7)	(8)
出生年	-.394 *** (.013)	-.391 *** (.016)	-.373 *** (.019)	-.354 *** (.022)	-.428 *** (.015)	-.441 *** (.021)	-.451 *** (.027)	-.450 *** (.027)
教育年數	.536 *** (.046)	.409 *** (.057)	.739 *** (.066)	.557 *** (.079)	.277 *** (.065)	.213 * (.086)	.150 (.102)	.151 (.101)
教育年數×出生年	.020 *** (.001)	.020 *** (.001)	.017 *** (.002)	.018 *** (.002)	.024 *** (.002)	.023 *** (.002)	.025 *** (.002)	.025 *** (.002)
女性	.646 (.443)	.017 (.449)					-.275 (.743)	-.270 (.743)
女性×出生年	-.018 (.010)	-.008 (.010)					.0004 (.016)	.0002 (.016)
外省	3.11 *** (.592)	2.50 *** (.602)	2.91 *** (.705)	2.23 ** (.714)	3.07 ** (1.19)	2.46 * (1.22)	5.54 *** (1.27)	5.31 *** (1.28)
外省×出生年	-.044 *** (.013)	-.045 *** (.013)	-.032 (.02)	-.032* (.016)	-.050 * (.02)	-.051 * (.03)	-.099 *** (.03)	-.102 *** (.03)
父親教育年數		.190 ** (.067)		.230 ** (.088)		.165 (.106)	.080 (.119)	.072 (.119)
父親教育×出生年		-.002 (.001)		-.003 (.002)		-.002 (.002)	.000 (.002)	.001 (.002)
社會經濟地位分數		.039 * (.019)		.073 ** (.025)		-.010 (.029)	-.005 (.034)	-.002 (.034)
社會經濟指標×出生年		.0001 (.0004)		-.001 (.001)		.001 * (.001)	.001 (.001)	.001 (.001)
父任職公家機構							-2.23 (1.25)	-2.38 (1.26)
公家機構×出生年							.057 * (.026)	.053 * (.026)
公家機構×外省								1.26 (.652)
常數項	41.7 *** (.495)	40.91 *** (.643)	40.22 *** (.667)	38.7 *** (.854)	43.6 *** (.561)	43.4 *** (.886)	43.68 *** (1.16)	43.65 *** (1.16)
N	25217	25217	13104	13104	12113	12113	9310	9310
F	1086	713.2	764.7	439.2	720.5	415	229.2	213.1
調整R ²	0.232	0.237	0.226	0.231	0.229	0.235	0.242	0.242

註1：* $p < .05$ ** $p < .01$ *** $p < .001$ ，括弧內的數字為標準誤。

註2：模型（7）及（8）的樣本數減少，主要是因為社會變遷調查中，僅有六期的資料有關於父親是否任職公家機關的測量。

（三）公教部門的集中趨勢分析

本研究的第二組假設企圖檢驗以族群在職場上的類聚、或政治排外作為維繫外省優勢的論述。假設二（A）與（B）檢驗外省人是否在學校及公家部門有特別集中的現象，假設二（C）檢驗任職公教機構是否對於子女的教育與職業地位有正面的影響。假設二（D）檢驗外省人在私部門擔任雇主與自雇是否有較高的比例。

圖2為從79年普查資料中所計算出的各族群之公、私立教師的比例。民國79年時，公立學校教師人數約161,603，占就業人口的2.58%；私立學校教師人數為60,497，占0.97%。在公立學校教師方面，由於光復初期本省人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因此在二年級世代中，外省人擔任教師的比例比本省人高出甚多。隨著師範教育的普及與義務教育所帶來的教師需求，本省女性擔任教師的比例，在二、三年級世代中急速上升，從三年級「前段班」的世代開始，本省女性擔任教師的比例已經超過外省男性。圖中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在同一個性別組中，外省人與本省人擔任公立教師比例的差異隨著世代逐漸縮小，至五年級生時，僅剩下性別的差別，而沒有族群背景的差異。在私立學校方面，外省人在各世代中的私校教師比例都超過本省人，並沒有如公立學校般有縮小差異的趨勢。由於擔任教師必須至少有專上的學歷，因此如果考量外省人專上學歷的比例為本省人的一倍以上（外省人專上的比例36%，本省人專上以上學歷16%），則外省教師比例稍高應該是十分正常的現象。反而是公立學校中，本省與外省教師的比例約略相等才是不尋常的現象。這一點可能與我國的師資培育制度有關。早期任職於公立學校必須是師範體系畢業的學生，由於師範學校不但不需繳交學費、又有各種生活津貼，加上畢業後的工作保障，對於社經地位較差、無力負擔高等教育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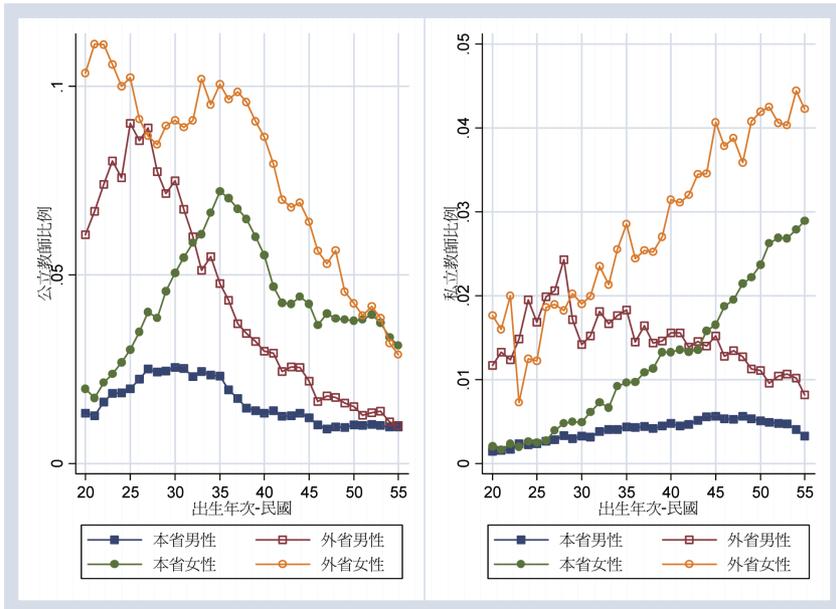


圖2 公私立學校教師占各籍貫組就業人口之比例
(公立教師人數 N=161603；私立學校人數：N=60497)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79年臺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

費的本省家庭而言，是一個向上流動的極佳管道，加上在師範體系中，社經地位較高的外省人比例本來就偏低，造成外省人從事教職比例與本省人約略相當的「不正常」現象。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為外省人在私立學校任職的比例顯著地高於本省人。由於早期私立學校的設立，需要政府的「特許」，因此私校的主事者以外省人居多，外省教師在私校中比較容易透過類似薦舉的方式進入私立學校。這個證據似乎顯示族群社會資本比較容易在私立學校運作，公立學校因為需要透過聯考、師範教育、分發等一系列的公開徵選考試，因此族群社會資本比較沒有運作的空間。由於公立學校的教師人數

遠超過私校，且學校聲望也較高，即便私校中有較高的外省籍教師比例，也很難透過這些力量來「再製」教育不平等。

圖3顯示受政府雇用比例的世代趨勢，由圖可以清楚看出本省人任職於政府部門的比例穩定維持在10%左右，而外省人任職於政府部門的比例從早期的40%，持續下降至與本省人的比例約略相等。即使將擔任公職所需的學歷條件納入考量，外省人在早期的政府中仍有高於專上人口的比例。不過外省男性在公部門的比例，從民國35年以後出生的世代就逐年下降。綜合以上普查資料的分析，假設二（A）與（B）皆得到支持，即外省人在光復初期任職於公、教部門的比例偏高，部分原因是因為外省與本省的教育程度差異所致，不過偏高的比例並沒有長期維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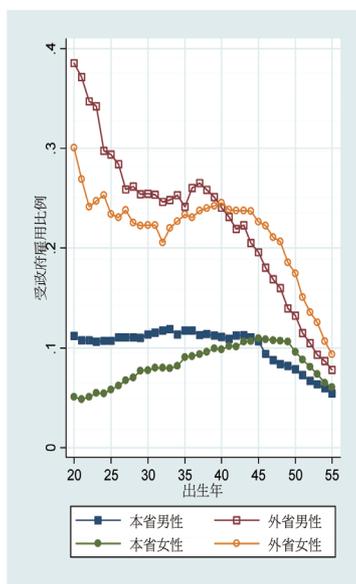


圖3 受政府雇用之比例 (N=668,779)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79年臺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

的現象。當兩族群的教育程度逐漸拉近後，外省人在學校及政府任職的比例反而略低於其應有的比例。因此「公教部門的外省籍比例偏高」並不是一個長期穩定的現象。

（四）公教背景對於子女教育及初職聲望的影響

另一種外省優勢的論述著重「公教補貼」政策對於子女教育所產生的正面影響。從表1的最後一組模型可以看出，父親任職於公家機構，對於子女的教育取得，並沒有顯著的影響；且「公家機構」無論是與「外省」，或與「世代」的交互作用項，都未達顯著水準。額外的分析顯示，若不考量世代的交互作用項，「公家機構」的係數為顯著的正值，顯示的公教補助可能僅在部分早期世代中發揮作用，但長期來看，並沒有穩定的影響。表2的最後一組模型檢定父親任職於公家機構是否影響子女的初職聲望。模型（7）的結果顯示，在早期出生世代中，父親任職於公家機構，子女的初職聲望較低（主效果的係數為-2.23, $p < 0.075$ ），但這個差異有隨世代下降的趨勢（交互作用項的係數為0.057, $p < 0.029$ ）。模型（8）的結果顯示父親任職於公家機構所產生的劣勢，對於外省人來說較小。綜合這兩個結果，我們至少可以說，父親任職於公家機構對子女的教育與職業地位並沒有特別的幫助。因此，公教人員子女因為政府補貼而產生競爭優勢的說法得不到支持。

（五）自雇與雇主比例的分析

外省人是否能透過企業菁英階級的內部薦舉流動來維繫優勢地位？假設二（D）檢驗這個論述。圖4顯示在79年人口普查的就業人口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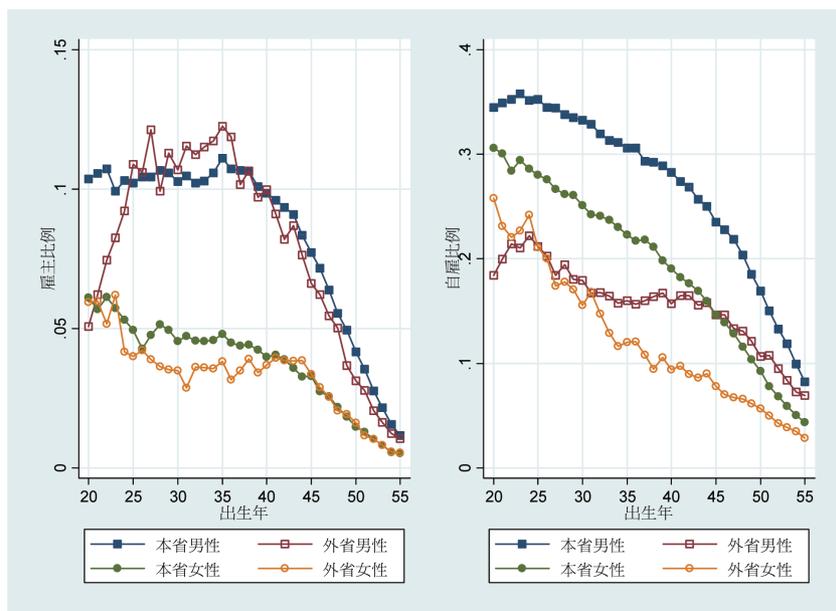


圖4 雇主與自雇比例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79年臺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

排除務農人口與在公部門任職者之後，各族群組內從業身份被歸為「雇主」、「自雇」的比例。整體來看，雇主與自雇的比例有隨世代逐年下降的趨勢⁴，且雇主的比例似乎只有性別的差異，但沒有明顯族群的

⁴ 雇主的比例混淆了兩種不同的效果：（1）世代效果：因產業與就業結構的變化，晚期世代變成受雇「上班族」的機率高於早期世代。（2）生命週期效果：擔任雇主與自雇的機率與年齡成正相關，即初入勞動市場者擔任雇主的比例較低。雖然本文的分析無法區分這兩種效果，不過產業的結構性變化與職涯發展的生命週期，對各族群應有相同的影響，比較同世代之內四個不同「族群—性別」組的雇主比例，仍然具有參考價值。

差別，而「自雇」的比例則以本省籍的比例較高。Yu & Su (2004) 的研究指出，自雇業的工作條件雖然較差、工時也較長，但總收入經常高於具有相同人力資本的一般受雇者，因此，他們長期累積財富的能力較佳，且具升級成「雇主」之潛力，為勞動階級向上流動的重要管道。從整體的趨勢來看，在早期的世代中，外省雇主的比例並沒有偏高的現象；且因人數的限制，九成以上的企業仍然是掌握在本省籍雇主的手中，加上「自雇」業者多為本省籍，外省人要在私部門形成菁英階級實有數量上的限制。因此沒有足夠證據可以支持外省人可以透過內部薦舉流動來維繫優勢地位的論述。

(六) 認知能力差異的分析

本文的第三組假設檢驗族群文化資本的論述。假設三 (A) 與 (B) 檢定外省背景對於認知能力的表現，是否有顯著的影響。表3顯示綜合分析能力的迴歸模型結果。

假設三 (A) 的分析重點在於控制了語言流利度及父母社經背景後，籍貫背景對於認知能力是否還有獨立的影響？父母籍貫的影響以八個虛擬變數的係數來衡量。如果外省籍背景隱含某種文化資本上的優勢，則外省背景對於認知能力應有正面的影響，且影響係數的大小應依循下列的順序：父母同為外省 > 父母之一為外省 > 父母皆非外省。

表3的模型 (1) 顯示，控制本人的各種語言流利程度之後，籍貫仍有顯著的影響。除了「父陸母客」之外，父或母之一為外省人者，在綜合分析能力的測驗成績上似乎都優於「父閩母閩」的表現。而「父客母客」這一組人的測驗成績較各組差。模型 (2) 顯示，控制了性別、城鄉別、及公私立別後，籍貫背景仍有獨立顯著的影響。模型 (3) 加入

表3 綜合分析能力之迴歸模型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本人母語流利程度					
本人閩南語流利	.00 (.01)	.02 (.01)	.04 (.01)***	.08 (.01)***	.08 (.01)***
本人客家話流利	-.16 (.03)***	-.12 (.03)***	-.11 (.03)***	-.12 (.03)***	-.12 (.03)***
本人國語不流利	-.66 (.02)***	-.64 (.02)***	-.61 (.02)***	-.58 (.02)***	-.57 (.02)***
籍貫組合(父閩母閩)					
父閩母客	.05 (.02)*	.06 (.02)*	.03 (.02)	.00 (.02)	-.01 (.02)
父閩母陸	.17 (.02)***	.14 (.02)***	.08 (.02)***	.00 (.02)	-.01 (.02)
父客母閩	.02 (.03)	.04 (.02)+	.02 (.02)	-.01 (.02)	-.01 (.02)
父客母客	-.11 (.02)***	-.05 (.02)*	-.06 (.02)**	-.07 (.02)**	-.07 (.02)**
父客母陸	.14 (.05)**	.14 (.05)**	.09 (.05)+	.00 (.05)	.00 (.05)
父陸母閩	.14 (.02)***	.10 (.02)***	.06 (.02)*	-.03 (.02)	-.03 (.02)
父陸母客	.08 (.05)	.08 (.05)	.05 (.05)	-.07 (.05)	-.06 (.05)
父陸母陸	.15 (.03)***	.11 (.03)***	.05 (.02)+	-.09 (.02)***	-.09 (.02)***
學制(普通高中)					
國中	-.51 (.01)***	-.52 (.01)***	-.48 (.01)***	-.46 (.01)***	-.45 (.01)***
綜合學程	-1.00 (.03)***	-.87 (.03)***	-.80 (.03)***	-.76 (.03)***	-.74 (.03)***
高職	-1.28 (.02)***	-1.24 (.02)***	-1.14 (.02)***	-1.08 (.02)***	-1.06 (.02)***
五專	-.91 (.02)***	-.71 (.02)***	-.66 (.02)***	-.62 (.02)***	-.61 (.02)***
私立學校(公立)		-.21 (.01)***	-.26 (.01)***	-.26 (.01)***	-.27 (.01)***
學校所在地(都市)					
鄉村		-.53 (.02)***	-.45 (.02)***	-.43 (.02)***	-.40 (.02)***
城鎮		-.20 (.01)***	-.16 (.01)***	-.14 (.01)***	-.13 (.01)***
女生		-.05 (.01)***	-.04 (.01)***	-.03 (.01)***	-.03 (.01)**
全家收入(不到兩萬)					
2萬元~5萬元			.19 (.02)***		.15 (.02)***
5萬元~10萬元			.40 (.02)***		.26 (.02)***
10萬元~15萬元			.59 (.03)***		.31 (.03)***
15萬元~20萬元			.66 (.03)***		.36 (.03)***
20萬元以上			.66 (.05)***		.36 (.05)***
父親教育程度(高中以下)					
高中、高職				.12 (.01)***	.09 (.01)***
專科				.29 (.02)***	.24 (.02)***
一般大學				.38 (.02)***	.32 (.02)***
研究所				.51 (.04)***	.44 (.04)***
母親教育程度(高中以下)					
高中、高職				.13 (.01)***	.11 (.01)***
專科				.31 (.02)***	.27 (.02)***
一般大學				.43 (.03)***	.37 (.03)***
研究所				.44 (.06)***	.37 (.06)***
常數項	.63 (.01)***	.78 (.01)***	.41 (.03)***	.44 (.02)***	.26 (.03)***
調整R ²	.229	.256	.286	.313	.319
N	23557	23545	23423	23318	23200

括弧中的數字為標準誤，***P<.001，**P<.01，*P<.05，+P<.1。

全家收入後發現，「父陸母陸」及「父客母陸」的影響轉成接近顯著邊緣，且其他原本顯著的族群迴歸係數都有減小的趨勢，顯示在控制家庭收入後，外省背景的影響有削弱的現象。因此，外省本省的認知能力差異，部分是因為外省家庭收入較高，較有能力投資兒女的人力資本所致。模型（4）加入父母的教育程度後，所有的外省背景優勢完全消失，表示外省在分析能力上的優勢，是因為有較高人力資本的外省父母，「再製」了兒女的人力資本。令人驚訝的是，控制父母親教育程度後，「父陸母陸」這一組人的綜合能力成績表現居然低於「父閩母閩」這一組人。表示父母皆為外省的子女，在綜合分析能力上反而略低於同樣社會經濟背景之本省子女。模型（5）顯示加入所有變數之後的結果，從族群背景的整體顯著模式可以看出，族群背景的影響是一個混和其他變數影響的虛假效果，背後兩個重要的隱藏解釋變數為家庭經濟地位及父母的人力資本。綜合模型（3）至模型（5）的結果，假設三得到支持：父母為外省族群背景對於這一代中學生的認知能力表現上並沒有特殊的影響。

爲了要驗證假設四（A），即外省籍的背景僅影響語文相關的能力而不影響數學及科學能力的表現，我們進一步將「綜合分析能力」的測驗分數拆解成「一般分析能力」、「數學能力」。表4與表5所呈現的迴歸分析結果，與表3所呈現的結果十分類似，無論是一般分析能力與數學能力，外省族群背景的優勢，在控制了家庭背景因素之後都變成不顯著或是逆轉，尤其是在數學能力的表現上甚是明顯，父親為外省籍的三組人中，其數學成績皆顯著地低於「父閩母閩」這一組人。進一步的分析顯示，在父親同為外省人中，「父陸母陸」的數學能力分數低於「父陸母閩」的學生，其差異接近顯著水準（ $F=3.62, \text{prob} > 0.0573$ ），顯示母親為閩南人似乎有助於數學能力的提升。這個結果當然無法簡單的以

表4 一般分析能力之迴歸模型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本人母語流利程度					
本人閩南語流利	-.01 (.01)	.00 (.01)	.02 (.01)+	.05 (.01)***	.05 (.01)***
本人客家話流利	-.14 (.03)***	-.11 (.03)***	-.10 (.03)***	-.12 (.03)***	-.11 (.03)***
本人國語不流利	-.49 (.02)***	-.48 (.02)***	-.46 (.02)***	-.44 (.02)***	-.43 (.02)***
籍貫組合 (父閩母閩)					
父閩母客	.02 (.02)	.03 (.02)	.01 (.02)	-.01 (.02)	-.02 (.02)
父閩母陸	.15 (.02)***	.12 (.02)***	.08 (.02)***	.01 (.02)	.00 (.02)
父客母閩	.02 (.02)	.04 (.02)	.01 (.02)	.00 (.02)	-.01 (.02)
父客母客	-.13 (.02)***	-.08 (.02)***	-.09 (.02)***	-.09 (.02)***	-.09 (.02)***
父客母陸	.13 (.05)*	.13 (.05)**	.09 (.05)+	.02 (.05)	.03 (.05)
父陸母閩	.14 (.02)***	.11 (.02)***	.08 (.02)***	.01 (.02)	.01 (.02)
父陸母客	.03 (.05)	.03 (.05)	.00 (.05)	-.09 (.05)	-.08 (.05)
父陸母陸	.11 (.03)***	.09 (.03)***	.03 (.03)	-.07 (.03)**	-.07 (.03)**
學制 (普通高中)					
國中	-.35 (.01)***	-.35 (.01)***	-.32 (.01)***	-.31 (.01)***	-.30 (.01)***
綜合學程	-.73 (.03)***	-.63 (.03)***	-.57 (.03)***	-.54 (.03)***	-.52 (.03)***
高職	-.92 (.02)***	-.89 (.02)***	-.81 (.02)***	-.77 (.02)***	-.75 (.02)***
五專	-.57 (.02)***	-.41 (.02)***	-.37 (.02)***	-.35 (.02)***	-.34 (.02)***
私立學校 (公立)		-.16 (.01)***	-.19 (.01)***	-.19 (.01)***	-.20 (.01)***
學校所在地 (都市)					
鄉村		-.47 (.02)***	-.40 (.02)***	-.39 (.02)***	-.36 (.02)***
城鎮		-.15 (.01)***	-.12 (.01)***	-.11 (.01)***	-.10 (.01)***
女生		-.09 (.01)***	-.08 (.01)***	-.08 (.01)***	-.08 (.01)***
全家收入 (不到兩萬)					
2萬元~5萬元			.15 (.02)***		.12 (.02)***
5萬元~10萬元			.32 (.02)***		.21 (.02)***
10萬元~15萬元			.47 (.03)***		.26 (.03)***
15萬元~20萬元			.51 (.04)***		.28 (.04)***
20萬元以上			.56 (.04)***		.33 (.04)***
父親教育程度 (高中以下)					
高中、高職				.10 (.01)***	.08 (.01)***
專科				.23 (.02)***	.19 (.02)***
一般大學				.30 (.02)***	.25 (.03)***
研究所				.40 (.04)***	.34 (.04)***
母親教育程度 (高中以下)					
高中、高職				.11 (.01)***	.09 (.01)***
專科				.24 (.02)***	.20 (.02)***
一般大學				.31 (.03)***	.26 (.03)***
研究所				.36 (.06)***	.29 (.06)***
常數項	.44 (.01)***	.58 (.01)***	.29 (.02)***	.32 (.02)***	.18 (.02)***
調整R ²	.138	.160	.183	.199	.205
N	23557	23545	23423	23318	23200

括弧中的數字為標準誤，***P<.001，**P<0.01，*P<0.05，+P<0.1

表5 數學分析能力之迴歸模型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本人母語流利程度					
本人閩南語流利	.00 (.01)	.02 (.01)	.04 (.01)***	.07 (.01)***	.07 (.01)***
本人客家話流利	-.15 (.03)***	-.12 (.03)***	-.10 (.03)***	-.11 (.03)***	-.11 (.03)***
本人國語不流利	-.57 (.02)***	-.56 (.02)***	-.54 (.02)***	-.51 (.02)***	-.51 (.02)***
籍貫組合(父閩母閩)					
父閩母客	.02 (.02)	.03 (.02)	.01 (.02)	-.02 (.02)	-.03 (.02)
父閩母陸	.13 (.02)***	.10 (.02)***	.05 (.02)*	-.02 (.02)	-.03 (.02)
父客母閩	.00 (.03)	.03 (.02)	.00 (.02)	-.02 (.02)	-.02 (.02)
父客母客	-.10 (.02)***	-.04 (.02)+	-.05 (.02)*	-.06 (.02)*	-.06 (.02)**
父客母陸	.08 (.05)	.08 (.05)	.03 (.05)	-.05 (.05)	-.05 (.05)
父陸母閩	.10 (.02)***	.06 (.02)**	.02 (.02)	-.05 (.02)*	-.05 (.02)*
父陸母客	.00 (.05)	.00 (.05)	-.03 (.05)	-.13 (.05)*	-.13 (.05)*
父陸母陸	.08 (.03)***	.05 (.03)*	-.01 (.02)	-.13 (.02)***	-.13 (.02)***
學制(普通高中)					
國中	-.46 (.01)***	-.46 (.01)***	-.43 (.01)***	-.42 (.01)***	-.41 (.01)***
綜合學程	-.92 (.03)***	-.80 (.03)***	-.73 (.03)***	-.71 (.03)***	-.69 (.03)***
高職	-1.13 (.02)***	-1.09 (.02)***	-1.00 (.02)***	-.96 (.02)***	-.93 (.02)***
五專	-.81 (.02)***	-.63 (.02)***	-.59 (.02)***	-.56 (.02)***	-.55 (.02)***
私立學校(公立)		-.19 (.01)***	-.23 (.01)***	-.22 (.01)***	-.24 (.01)***
學校所在地(都市)					
鄉村		-.51 (.02)***	-.44 (.02)***	-.43 (.02)***	-.40 (.02)***
城鎮		-.18 (.01)***	-.15 (.01)***	-.13 (.01)***	-.12 (.01)***
女生		-.11 (.01)***	-.10 (.01)***	-.10 (.01)***	-.10 (.01)***
全家收入(不到兩萬)					
2萬元~5萬元			.18 (.02)***		.15 (.02)***
5萬元~10萬元			.37 (.02)***		.25 (.02)***
10萬元~15萬元			.53 (.03)***		.30 (.03)***
15萬元~20萬元			.59 (.03)***		.34 (.03)***
20萬元以上			.59 (.05)***		.35 (.04)***
父親教育程度(高中以下)					
高中、高職				.10 (.01)***	.08 (.01)***
專科				.25 (.02)***	.21 (.02)***
一般大學				.31 (.02)***	.25 (.02)***
研究所				.45 (.03)***	.37 (.04)***
母親教育程度(高中以下)					
高中、高職				.12 (.01)***	.10 (.01)***
專科				.27 (.02)***	.23 (.02)***
一般大學				.37 (.03)***	.32 (.03)***
研究所				.35 (.06)***	.28 (.06)***
常數項	.58 (.01)***	.74 (.01)***	.41 (.03)***	.45 (.02)***	.28 (.03)***
調整R ²	.186	.214	.238	.257	.263
N	23557	23545	23423	23318	23200

括弧中的數字為標準誤，***P<.001，**P<.01，*P<.05，+P<.1

「閩南人的數學能力較佳」來解釋，我們認為這個結果與外省背景的女生在語言上的相對優勢，及外省父母職業選擇對於子女的學科性向選擇的影響有關；我們將在結論中進一步討論這個結果的意涵。

外省背景子女是否有較高的語言相關能力？由於資料中並無單獨測量語言能力的指標，因此我們無法針對語言能力進行直接分析。但我們可以從比較表3至表5的結果，來推論外省背景對於語言能力的影響。綜合表3至表5的分析我們得到以下的結論：控制了父母經濟地位及教育程度後，父親為外省籍者，其數學能力表現比「父閩母閩」為差，且「父陸母陸」在「綜合分析能力」、「一般分析能力」與「數學分析能力」的分數皆低於「父閩母閩」。由於「綜合分析能力」的指標混雜了「一般分析」、「數學」、「語言」、與「科學」四類題目，如果外省籍子女的數學能力與一般分析能力較「父閩母閩」為差，由於科學與數學及一般分析能力相關性甚高，則一個合理的推論為，外省籍子女的科學相關測驗分數應該也不會超過數學分數較高的閩南籍學生。由於「父陸母陸」對於代表總分的「綜合能力」的影響係數（-0.09）〔表3模型（5）〕小於「父陸母陸」對於數學能力的影響係數（-0.13）〔表5模型（5）〕，顯示其他科目的得分數可能「拉抬」了「父陸母陸」這一組人在「綜合分析能力」上的表現。由於「父陸母陸」在「一般分析能力」的表現也較差，加上科學與數學的能力高度相關，因此外省籍子女透過語文測驗題來「拉抬」綜合能力的表現可能性甚高。有關外省人語言能力較佳的其他證據，請參考蔡淑鈴（2001）的分析。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得到一個頗令人意外的結果，即在年輕世代中，外省籍子女在數學能力的表現上似乎不若相同家庭背景的閩南籍同儕。一個可能的解釋為，外省籍子女有較高的「文」科性向。由於聯考的分組制度，使得學生必須及早決定類組，以便能將努力集中於考試科

目。多花時間在自己有興趣或拿手的科目上，自然會剝奪研讀其他科目的時間。這種按照類組來分配科目準備時間的考試策略，有可能對於非拿手科目的學習產生排擠效果；例如以文組為志向的學生，一般對於數學的學習興趣不高，導致「自我實現預言」式地掉落到「數學較差」的自我意象與惡性循環中。由於研習各種科目的時間彼此競爭，投資太多時間在語文科目上自然會剝奪數學科目的學習時間，導致「文」科性向較高的外省籍子女在數學能力的表現上略低於「父閩母閩」。因此假設四的檢定得到一個混雜的結果，外省籍的背景對於語言相關科目的表現可能有正面的影響，但對數學能力的表現卻有負面影響。這個結果顯示，外省背景在語言上的親近性，可能對於外省子女的學習性向有某種程度的影響。

（七）科系的族群分佈分析

認知能力的分析結果指出一個省籍背景對於子女教育的可能影響途徑，即由於語言與文化上的親近性，外省籍背景可能會影響子女性向的選擇，進而間接影響特定分析能力的表現。外省人的文科性向偏高，除了因為語言文化上的親近性，比較容易對語文相關的科目產生興趣外，也可能與較多外省父母具文科背景及從事語文相關的「文」職工作有關。因此一個延伸的問題為：外省人選擇語文相關科系或職業的比例是否較本省人高？圖5顯示各世代的大學生就讀文科比例的變化趨勢，由圖可知，女性就讀文科的比例顯著的高於男性，且文科生性別比例的差異似乎有隨世代擴大的趨勢。重要的是，在同一性別組中，外省人就讀文科比例都比本省人高，且這個差異並沒有隨世代下降的趨勢，因此假設四（B）似乎得到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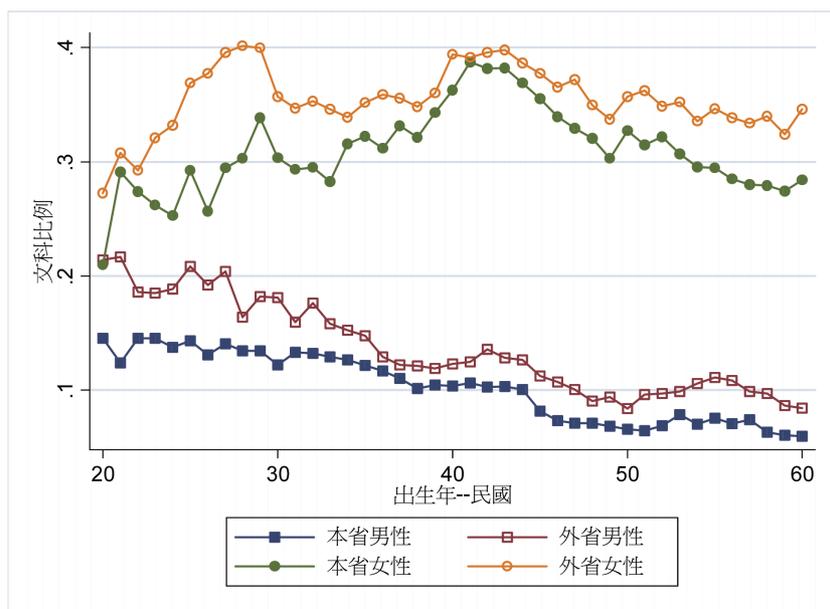


圖5 本省與外省大學以上文科學生比例之變化 (N=174,131)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79年臺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

如果語言文化在考試上的優勢，是較多外省人就讀「文」組的原因，則我們應該在當時聯考制度之下被歸類成「丁組」的社會科學（含法律）及商學相關科系中，看到同樣的趨勢。圖6的結果顯示，本省女性就讀社會科學比例為四組之冠，且外省男性就讀社會科學的比例並沒有顯著地比本省男性高。商學畢業生的變化較為複雜。本省「四、五年級」的女性就讀於商管科系的比例比外省女性高，而本省「二、三年級」男性就讀商科的比例比同世代的外省人高，但這個差異有明顯的縮小趨勢。到了「六年級」時，僅剩下性別的差異，外省與本省已無明顯的差異。

綜合以上對科系分佈的分析結果，我們發現外省人的確有較集中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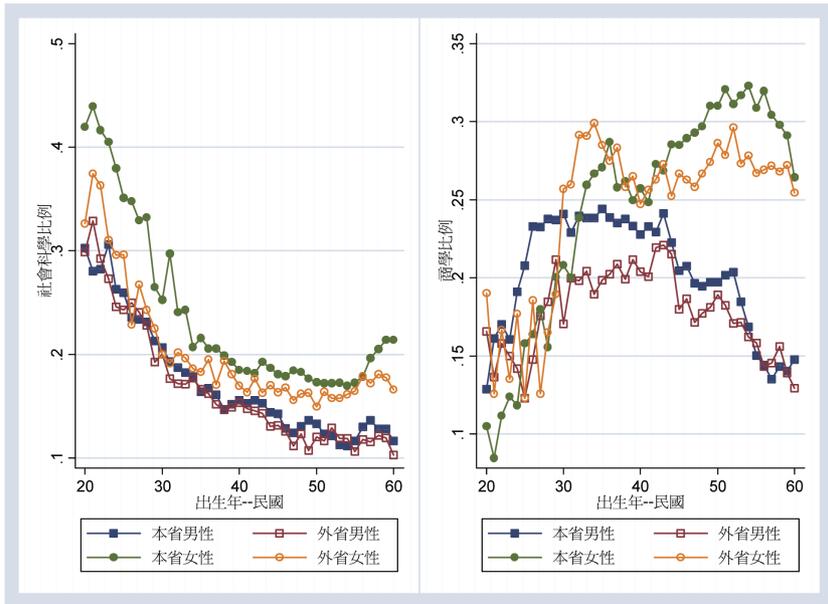


圖6 本省與外省大學以上法商科學生比例之變化
(社：N=148,699；商：212,483)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79年臺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

語言相關科系上的現象，但較高的比例不是平均分佈於所有語言相關的科系中，而是僅在「文」科有較高的比例，法商的比例反而略低。為什麼外省人僅在文科比例偏高，但同樣屬於「社會組」的社會科學與商科的「丁組」，卻沒有較高的比例？一個可能的原因在於考試科目的加權計分所造成的誘因。由於文組考生在「國文」一科加重計分，但很多法商科系卻加重「數學」一科的成績計分，造成國文造詣較佳、但對於數學較沒有比較優勢的外省籍學生比較傾向於投考文組。這一個解釋與我們先前對於族群背景對認知能力的分析結果一致。第二種可能的解釋來自於家庭的社經背景對於實用知識偏好的影響。由於文組與法商的實用

價值有別，社會經濟背景較差的本省家庭，比較可能因憂心將來出路問題，而鼓勵子女選擇事業前景較可預期的法商科系。第三個可能的解釋來自於家長的職業對子女性向的直接影響。由於外省籍家長較常從事「文」職，其職業可能影響子女對未來職業選擇的偏好，進而影響子女之科系選擇。我們在以下對假設四（B）的分析中，進一步檢驗這個解釋。

（八）職業的集中趨勢分析

如果外省人在文科有較高的比例，則是否在職業的選擇上也有類似的集中傾向？如果外省人在職業上也有集中於語言相關職業的趨勢，則可以間接證明性向在特定族群背景的家庭中有被再製的情形。表6顯示外省人比例最高的前50個職業類別。在超過七百萬的就業人口中，有11.2%的就業人口為外省籍。由於前50名的職業大都需要大學以上學歷，因此更正確的比較基準，應是與外省的大學人口比例來作比較。在所有外省男性中，大學以上占25.5%，所有外省女性中，大學以上學歷占14.5%。因此要衡量外省人是否集中於特定職業，須比較該職業的外省人，是否有高過其職業所需教育程度的比例。另外由於受雇於政府單位的外省人較多，我們分別計算各職業在民間部門與政府部門的外省人比例。

從表6中可以看出，外省人較為集中的職業大體可分為三大類：一為專業人士，如物理學家、社會學家、數學家、化學家、及經濟學家等高階專業人員。第二類職業為與軍、警背景有關者，如航空、輪機、船舶引航、飛機修理、航空業務監督人員、水手、典當業者、公共安全工作人員等共九類職業。第三是從事與語言、傳播媒體相關的職業，如製

表6 外省人比例最高的前50種職業 (1990人口普查)

所有職業之合計	(1) 非受政府雇用				(2) 受政府雇用				(1)+(2)		
	男	女	小計		男	女	小計		總計		
	.082	.133	.100	6119214	.167	.260	.202	884607	.112	7003821	
職業類別	%	%	%	N	%	%	%	N	%	N	
1 航空人員	軍	.631	.615	.629	1027	.583	.677	.595	501	.618	1528
2 輪機人員	軍	.544	.583	.544	1534	.578	.250	.574	345	.550	1879
3 艙面監管及引水人員	軍	.508	.538	.509	1674	.492	.500	.492	421	.505	2095
4 製作人	文	.441	.542	.474	930	.534	.650	.582	98	.484	1028
5 航空業務監督人員	軍	.474	.504	.482	492	.429	.486	.440	184	.470	676
6 物理學家	專	.317	.750	.356	45	.424	.542	.437	222	.423	267
7 編輯	文	.399	.408	.404	5129	.538	.593	.567	672	.423	5801
8 社會學/人類學家等	專	.261	.333	.298	47	.451	.354	.409	257	.391	304
9 其他物理學家	專	.478	.286	.433	30	.385	.353	.381	147	.390	177
10 飛機修理工	軍	.413	.269	.407	1170	.342	.412	.345	894	.380	2064
11 作家及評論家	文	.369	.362	.366	423	.500	.750	.625	16	.376	439
12 新聞記者	文	.317	.433	.351	5557	.423	.539	.466	556	.362	6113
13 語言學家及翻譯人員	文	.388	.325	.346	878	.413	.421	.417	211	.360	1089
14 作家、新聞記者等	文	.334	.356	.344	1360	.433	.470	.451	133	.354	1493
15 數學家及精算師	專	.278	.341	.301	123	.373	.500	.414	99	.351	222
16 圖書管理師	文	.333	.319	.321	137	.263	.386	.358	424	.349	561
17 演員及導演	文	.317	.294	.305	3400	.588	.589	.589	474	.339	3874
18 典當業業主	軍	.323	.396	.343	502	.150	.222	.172	29	.333	531
19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	文	.287	.357	.317	11987	.311	.402	.340	15903	.330	27890
20 化學家	專	.294	.111	.231	52	.386	.421	.395	76	.328	128
21 船舶機艙水手	軍	.321	.136	.316	781	.345	.667	.351	174	.323	955
22 系統分析師	專	.272	.400	.312	2058	.315	.500	.369	377	.321	2435
23 理化科學技術人員	專	.277	.216	.261	138	.317	.418	.332	599	.319	737
24 船舶艙面水手	軍	.307	.357	.308	2858	.356	.000	.353	761	.317	3619
25 人力及職業輔導人員	專	.267	.362	.305	318	.291	.290	.291	268	.299	586
26 經濟學家	專	.293	.299	.295	461	.277	.333	.298	218	.296	679
27 生物化學家等	專	.294	.188	.235	115	.330	.320	.326	184	.291	299
28 營養師	專	.111	.272	.251	347	.300	.355	.347	216	.288	563
29 程式設計師	專	.264	.308	.277	11621	.320	.420	.357	1629	.287	13250
30 生物學相關科學家	專	.105	.267	.176	34	.276	.329	.297	209	.280	243
31 公共安全人員	軍	.290	.405	.291	13794	.252	.342	.255	6693	.279	20487
32 土木工程師	專	.260	.372	.267	6473	.288	.428	.293	3780	.277	10253
33 圖書檔案佐理員	文	.266	.259	.261	952	.244	.293	.283	2063	.276	3015
34 舞蹈家	文	.340	.243	.266	222	.300	.346	.333	36	.275	258
35 其他工程師及技師	專	.255	.338	.265	4351	.266	.410	.282	2822	.271	7173
36 一般科醫師	專	.228	.374	.244	4070	.307	.344	.312	2209	.268	6279
37 文書佐理員	文	.211	.242	.232	30844	.257	.363	.324	19286	.267	50130
38 處理資料系統操作員	專	.211	.246	.236	10085	.244	.396	.352	3623	.267	13708
39 統計及數學佐理人員	專	.257	.222	.238	332	.209	.359	.294	299	.265	631
40 統計學家	專	.267	.167	.238	42	.320	.250	.286	49	.264	91
41 醫院管理人員	專	.121	.234	.176	529	.387	.413	.399	331	.262	860
42 市場調查員	專	.236	.304	.263	1440	.167	.368	.233	116	.261	1556
43 工業工程師	專	.256	.296	.261	2185	.239	.447	.259	1191	.260	3376
44 律師	專	.254	.296	.261	1628	.197	.316	.225	80	.259	1708
45 傳播設備操作工	文	.243	.300	.258	833	.200	.479	.263	213	.259	1046
46 接待員	文	.263	.248	.254	7402	.303	.325	.319	533	.258	7935
47 速記員及打字員	文	.200	.213	.212	8266	.332	.350	.349	4108	.257	12374
48 未分類其他專門性	專	.232	.277	.246	2293	.250	.324	.269	1362	.254	3655
49 電機及電子工程師	專	.254	.336	.261	18355	.222	.384	.230	6213	.253	24568
50 人事佐理員	文	.205	.236	.221	7877	.266	.338	.297	5731	.253	13608

% 為外省人所佔的比例

作人、編輯、作家、新聞記者、翻譯、圖書管理師、演員導演、專科以上教師等共15類職業。從這個分佈可以看出，外省人在高等教育機構與媒體相關職業的比例的確比較高。但若衡量職業所需的教育程度，則高階專業人員的外省人比例並不特別令人驚訝。但在文字媒體相關的職業中，的確有外省比例略高的情形，這個集中的情形似乎與語言有關，因此假設四（C）得到支持。當然，除了語言的親近性外，這些職業也與威權時代政府對於高等教育及媒體的控制有關，不能僅僅將之視為是因為語言及性向所造成的自然集中趨勢。不過，由於這些職業都需要高度的「語言」能力，因此形成一種特殊的區隔，使得外省族群背景在這些職業上似乎具有優勢。從絕對就業人數來看，這些職業的從業人口都不是很多，語言媒體相關職業的總就業人數僅佔所有就業人口的1.8%（N=128,719），軍職相關職業僅佔0.5%（N=33,834）。因此即使有族群壟斷的現象，對於勞動市場的影響，恐怕不如其在政治上所產生的影響來得大。但是對於僅佔當時七百萬就業人口比例11.2%的外省人而言，從事軍公教加上媒體語言相關職業的人口總數，超過其就業人口的30%。若以產業分佈來看，排除受雇於政府部門者，外省人在服務業的比例為57.2%，而本省人僅有37.3%的就業人口在服務業。另外早期外省移民由於沒有土地，因此從事農業的人口比例甚低。79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從事農林漁牧業的外省人不到百分之一。這些外省人在職業上的特殊分佈對於族群差異的縮減所造成的影響，我們將在結論中做進一步的討論。

五、結論與討論

本文首先以實證資料指出，族群在教育及職業地位上的差異，在過

去幾十年間急速地縮減。從這個差異縮減的經驗現象中，我們提出本文的研究問題，即作為一個優勢移民團體（migrant superordinate），外省族群為何無法維繫與再製其優勢地位？

本文的趨勢分析顯示，族群教育程度差異的縮小，主要是因為五年級以後的本省人與女性受惠於義務教育的延伸及中等學校的急速擴張，加上同時期外省男性的平均教育年數受限於高等教育的窄門、成長緩慢所共同造成的結果。其中較為突出的是，「外省女性」的教育程度快速成長，特別是在大學以上學歷的比例，其成長速度超過其他族群。在大學聯考的競爭中，由於女性投考「文組」的比例較多，而外省人在文（乙）組又因為語言的加重計分而較具比較優勢，致使外省女性成為高等教育人口增加最為快速的一組。科系的集中情形分析也顯示，外省女性選讀人文相關科系比例最高，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比例就讀「乙組」。這個結果建議：外省人即使受惠於語言上的優勢，也比較侷限在語言加重計分的人文科系。但因文組畢業生在就業路路的選擇上面臨較多的限制，這個聯考「優勢」，不必然對外省人的未來職業地位有正面的影響。

外省人的優勢是否可以透過學校或職場上的族群社會資本來再製？早期由於教育程度的差異，外省人在公教部門的比例較高，但這個差異逐年下降，在五年級以後出生的世代中，已經沒有明顯的省籍差異。若同時將「進入公教部門的學歷門檻較高」及「外省籍的教育程度較高」納入考量，則第二代外省人並沒有「不公平」地大量集中在公教部門的現象，僅在私立學校及媒體相關行業中的比例稍高。當族群教育程度的差異逐漸拉近之後，在需要透過國家考試或師範體系的訓練才能進入的公教部門中，外省比例下降的趨勢特別明顯。由於公教部門的「鐵飯碗」及師範體系的教育津貼補助，對於經濟較為弱勢的本省人十分具有

吸引力，清寒考生「棄大學而取師範」的情形時有所聞，導致公教部門中的本省籍人士急速增加。這個結果顯示族群社會資本最多僅能在少數戒嚴時期被「特許」的職業中運作，一般勞動市場並沒有族群「再製」的證據。也就是說，外省人雖在光復初期大量進入軍公教任職，但是因為缺乏再製族群會員的機制，因此軍公教就業人口的省籍差異迅速地被平均化。

初職聲望的分析顯示，教育對於就業的影響與日遽增，且隨著族群教育差異縮減，外省背景對於初職聲望的影響越來越不明顯。控制了家庭背景之後，父親任職於公家機構，對於子女的教育程度與初職職業聲望並沒有特別的影響，因此沒有充分證據顯示外省人長期受益於政治排外的補助政策。

儘管在軍公教中沒有族群「再製」的證據，但在早期世代中，外省人在公教單位及語言相關職業的比例遠高於本省人，則是一個明顯的現象。若以79年人口普查中近七百萬的就業人口中，外省人在軍公教任職的比例（28.43%）為本省人的一倍（13.08%）來推論，國民黨統治初期的比例應更勝於此。由於公教部門在戰後台灣發展的初期階段，屬於社經地位較高的職位，第一代外省移民大量在公部門就業，對於後代的教育及職業必然會有一定程度的正面影響。但在以製造業為主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集中於公部門也產生了幾個不預期的「副作用」。第一，公部門雖然有較好的工作保障，但其工作報酬經常受限於國家人事法令，不像私營部門可以隨經濟消長大幅調整，或透過「再生產」來快速累積財富。在經濟快速成長的時期，軍公教累積財富的能力相對較低。第二，維繫代間階級優勢，必須仰賴財富或資源的代間移轉。不若民營企業可以透過繼承將所經營的事業移轉給下一代，軍公教子女無法直接繼承公教身份。公部門就業的優勢主要是依附於「雇用位置」而非「人」，且

除了少數媒體產業外，這些行業大都必須通過國家考試取得就業資格，很難透過世代間的移轉來再製「會員」身份，因此無法形成穩固的地位。第三，由於進入公教部門必須透過國家考試取得任用資格，社會資本對於會員篩選的影響力較小。不若民間企業可以透過任用家族成員來維繫及累積家族的利益。第四、台灣經濟發展初期，由於「黑手」製造業在文化上的評價較低（culturally devalued），加上軍公教吸收了大量的外省就業人口，教育程度較高的外省人從事製造業的比例原本就不高。且加上早期世代的語言文化隔閡較大，外省人要在以本省人爲主的市場網絡中累積經商所需的人脈關係較爲困難。由於臺灣中小企業與協力網絡的特殊分工型態，可能會使外省人越來越不易打入以製造業爲主的經濟體系。反之，本省創業者較容易累積經營事業所需的社會資本，使得本省人在製造業中具有相對的競爭優勢。最後，公務人員終身雇用制度的保障，也有可能導致父母在子女的就業方向上，產生較爲風險迴避（risk averse）的態度，較不容易培育出有創業entrepreneurial精神的後代。我們（Yu and Su 2004）先前的研究指出，除了公營部門及政府單位外，臺灣勞動市場的條件一般都不好，加上政府的勞動法令規範不彰，導致在私部門的勞動者轉入自雇的誘因甚大。相較於公營部門，自雇業雖然風險較高，但機會也相對較多，在產業景氣起伏甚大的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培育出不少具有創業家精神的企業家，成爲向上流動的另一個管道。外省人長期集中在公部門所產生的一個不預期結果，是本省人在經濟發展中快速累積財富資本、工作經驗、社會資本、乃至企業家精神的同時，大量外省人卻受限於專業、軍、公、教等特殊職業身份與規範，逐漸喪失社經地位上的優勢。

外省人是否因爲語言及文化上的親近性，在教育競爭中具有優勢？認知能力的分析顯示，控制了語言流利度與家庭社經背景後，在新一代

的世代中，外省人在整體認知能力的表現上並沒有特別的突出。在新世代中，外省學生的平均認知能力分數較高，主要是因為家庭背景較佳及父母教育程度較高所致，而非語言及族群文化背景的親近性所導致的結果。我們認為外省人在語言與數學學科表現上的不同「比較優勢」，對於其未來經濟機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我們雖然沒有新世代性向選擇的資料，但從成人資料中可以看出，外省人的確在人文學科與語言相關的職業上有較高的比例。外省人集中在語言相關的職業及以行政文職為主的公教部門，可能產生幾個影響：第一，從事「文」職的父母，較容易對於子女的文科性向，產生正面影響，導致外省子女選擇人文學科的比例偏高。第二，從聯考策略上來看，語言上的相對優勢，使得外省人有較高的傾向報考語言加重計分的文科，而迴避數學加重計分的商管及理工科。第三，除了文組之外，聯考制度中數學成績對於升學的影響力一般高於國文成績⁵。外省人在語言上的比較優勢，導致較多外省人選擇就業前景不若理科的文科來就讀。長期來看，外省人第一代在語言文化上的親近性，在「重數理輕文史」的台灣教育體制與勞動市場的篩選過程中，反而成為其子女在競爭上的負擔（liability）而非優勢。

根據本文實證分析的結果，我們大膽地勾勒出本省與外省人在社會經濟地位上變化的可能圖像。雖然光復初期族群在教育與職場的區隔十分明顯，但無論是從薦舉流動或競賽流動的邏輯來考量，都沒有經驗證據顯示外省人已經形成一個特殊的階級地位。除了在公部門及少數文職

⁵ 我們根據民國75，80與85的大學聯考各科的成績計算出各類組的國文與數學的標準差，發現國文成績的標準差介於9.7分與12.9分之間，但數學的標準差介於16.2至23.7之間。其他自然科學如物理化學及生物等科目的標準差更超過數學。換句話說，數學與科學成績所能造成的志願排名上的差異遠超過國文成績所能產生的影響。

行業較為集中外，外省人在教育及職場上都沒有計畫性的「意圖」、也沒有「能力」來維繫這些因為歷史偶然所造成的區隔。反而是因為產業與職業的集中，造成在外省人在「創租資本」（rent-generating assets）的取得與累積上落後本省人。由於公部門受限於人事行政法規，除了少數黨國機器有運作空間的高層地位外，一般具有固定薪俸的公職地位創造超額經濟租的能力並不高，且由於國家考試制度，族群特定社會資本在這些公領域所能發揮的作用也十分有限。相反的，外省人在較具經濟發展潛力的工業及擁有土地的農業中人數較少，在創造經濟租所需的重要實體資本如土地、企業，及非實體資本如企業家精神與經商所需的社會資本，也相對較為缺乏。在人力資本方面，高比例外省父母從事具有終身工作保障的「文」職，加上語言與文化上的親近性，使得外省第二代在教育志向的選擇上，對於具有比較優勢的文科與「文」職持續保持較高的興趣。在以製造業為主的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這些公職與文職的市場價值與機會逐漸落後於私部門。除此之外，這些較缺乏市場競爭力的穩定「公家飯碗」，在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的累積上也不如民間企業快速。由於在實體資本、社會資本、人力資本的取得與累積上都不再具有優勢，加上職業集中所產生的副作用，族群的社經地位差異快速縮減，不是一個令人意外的結果。

我們可以理解大部分的人均傾向於投入自己較熟悉的世界，所以在一個移民社會中，族群在行、職業的類聚是十分普遍的現象。當每一個族群依其比較優勢而各自發展利基（niche）的同時，行、職業的「群聚」也可能限制了該族群在其他方面發展的機會與空間。依循Xie & Goyette（2003）所提出的「策略性調適」（strategic adaptation）模型及Breen & Goldthorpe的理性行動理論（rational action theory）的論述，本文嘗試指出，外省人基於政治統治上的需要與語言上的相對優勢，在

行、職業上所形成的類聚，對於其後代的志向選擇、職業機會、與社會流動產生了一些不預期影響。初期外省人集中在軍公教及語言媒體相關職業，反而導致外省人在其他較具發展潛力的民間工業中，無法形成集中的力量及累積產業所需的社會資本。雖然在經濟發展初期，軍公教享有較好的勞動條件與工作保障，但長期而言，公部門無論是在資源財富的創造、累積、與繼承上，都比不上「高風險、高報酬」的民間產業。外省人在語言與文化上的親近性及比較優勢，反而將其導向機會較為侷限的文組科系與有人文傾向的職業。初期外省人雖然有較高的人力資本與語言文化資本，但由於人數的限制與族群類聚的分佈結構，使得這些資本無法在缺乏族群特定社會資本的場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不同於過去以政治排外來討論族群不平等的論述，本文嘗試指出族群在各種機會結構及競爭場域中的人口分佈，可能是導致族群社會經濟地位迅速平等化的重要結構性因素。

作者簡介

蘇國賢，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主要研究興趣為社會流動、組織理論與社會網絡等相關議題。目前正在進行台灣的階級流動變化、專業學術社群的社會流動、及大學聲望對於地位取得的影響等研究。

喻維欣，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社會學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包含性別不平等、東亞的勞動市場及東亞社會變遷等相關議題。目前正在進行台、日、韓婦女之婚姻、生育、及就業行為的比較研究。新書即將由史丹福大學出版社出版。

參考書目

- 王甫昌，2002a，〈族群接觸機會？還是族群競爭？本省閩南人族群意識內涵與地區差異模式之解釋〉。《台灣社會學》4: 11-74。
- ，2002b，〈邁向台灣族群關係的在地研究與理論：「族群與社會」專題導論〉。《台灣社會學》4: 1-10。
- ，2003，〈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
- 吳乃德，1997，〈檳榔和拖鞋，西裝及皮鞋：台灣階級流動的族群差異及原因〉。《台灣社會學研究》1: 137-167。
- 林忠正、林鶴玲，1993，〈台灣地區各族群的經濟差異〉。頁101-155，收錄於張茂桂等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
- 林鶴玲、李香潔，1999，〈台灣閩、客、外省族群家庭中之性別資源配置〉。《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2: 475-528。
- 陳東升、陳端容，2002，〈跨族群政治討論網絡的形成及其影響因素〉。《台灣社會學》4: 119-157。
- 陳婉琪，2005，〈族群、性別與階級：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台灣社會學》10: 1-40。
- 陳端容、陳東升，2001，〈跨族群的社會連結：工具理性行動邏輯與社會結構的辯證〉。《臺灣社會學刊》25: 1-53。
- 曾嬾芬，1997，〈Ethnic Resources as Forms of Social Capital〉。《台灣社會學研究》1: 169-205。
- 楊孟麗、譚康榮、黃敏雄，2001，〈心理計量報告：TEPS 2001分析能力測驗〉。南港：中央研究院。
- 蔡淑鈴，2001，〈語言使用與職業階層化的關係：比較台灣男性的族群

- 差異〉。《台灣社會學研究》1: 1-44。
- ，2004，〈高等教育的擴展對教育機會分配的影響〉。《台灣社會學研究》7: 47-88。
- 蔡瑞明，1997，〈台灣的階級結構變遷與社會流動〉。頁18-55，收錄於張荳雲、呂玉瑕、王甫昌編，《90年代的台灣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 ，1999，〈台灣、美國與日本社會流動的結構分析〉。《臺灣社會學刊》22: 83-125。
- 駱明慶，2001，〈教育成就的省籍與性別差異〉。《經濟論文叢刊》29: 117-152。
- Bonacich, Edna, 1972, "A Theory of Ethnic Antagonism: The Split Labor Marke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 547-559.
- ，1976, "Advanced Capitalism and Black/White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plit Labor Market Interpret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1: 34-51.
- Bourdieu, Pierre, 1973,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Pp. 56-69 in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edited by Richard Brown. London: Tavistock (reprinted in Richard Arum and Irene R. Beattie (eds.) 2000. *The Structure of Schooling*.)
- 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 1976,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 Breen, Richard, and John H. Goldthorpe, 1997, "Explaining Educational Differentials: Towards a Formal Rational Action Theory."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9: 275-305.

- Breen, Richard, and Jan O. Jonsson, 2005,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Recent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Social Mobi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1: 223-244.
- Burt, Ronald S.,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 Vivien Wen-Chun, and Evelyn Yu-Ling Lin. 2004. "Political Exclusion or Socioeconomic Reproduction? Ethnic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Taiwan." in *TEPS 「教育階層化與家庭」小型研討會*. 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Coleman, James, 1966, *E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Opportunity*.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Cookson, Peter, and Caroline Persell, 1985, *Preparing for Power: America's Elite Boarding Schools*. New York: Basic Books.
- De Graaf, N. D., P. M. De Graaf, and G. Kraaykamp, 2000, "Parental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Netherlands: A Refinement of the Cultural Capital Perspectiv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3: 92-111.
- DiMaggio, Paul, 1982, "Cultural Capital and School Success: The Impact of Status Culture Participation on the Grades of Us High School Stud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 189-201.
- Entwisle, Doris R., Karl L. Alexander, and Linda Olson, 1997, *Children, Schools, and Inequalit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Inc.
- Erikson, R., and J. O. Jonsson, 1996, "Introduction: Explaining Class Inequality in Education: The Swedish Test Case." Pp. 1-64 in *Can Education Be Equalized?*, edited by R. Erikson and J. O. Jonsson.

Boulder, CO: Westview.

Firebaugh, Glenn, 1997, *Analyzing Repeated Surveys*.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Ganzeboom, Harry B. G., Paul M. De Graaf, and Donald J. Treiman, 1992, "A Standard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1: 1-52.

Hout, Michael, Adrain E. Raftery, and Eleanor O. Bell, 1993, "Making the Grade: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5-1989." Pp. 25-49 in *Persistent Inequality: Changing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irteen Countri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Jao, Jui-Chang, and Mathew McKeever. 2006. "Ethnic Inequalities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aiwa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9: 131-152.

Jencks, C., 1972, *Inequality, a Reassessment of the Effect of Family and Schooling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Kanter, Rosabeth M., 1977, *Men and Women of the Corpo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Kao, Grace, and Jennifer S. Thompson, 2003, "Racial and Ethnic Stratification i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and Attain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9: 417-442.

Lareau, Annette, 1987,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Family-School Relationships: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Capit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0: 73-85.

Lieberson, Stanley, 1961, "A Societal Theory of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 902-910.

- Light, Ivan, and Edna Bonacich, 1988,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Koreans in Los Angeles 1965-198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n, Holin, 1998, "Gender Culture as Economic Determinant: 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Strategies among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10: 611-659.
- Lin, Na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ogan, J. R., and R. D. Alba, 1999, "Minority Niches and Immigrant Enclaves in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Pp. 172-193 in *Immigrant and Opportunity: Race, Ethnicity, and 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F. D. Been and S. Bell-Ros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
- Logan, J. R., R. D. Alba, and T.L. McNulty, 1994, "Ethnic Economies in Metropolitan Regions: Miami and Beyond." *Social Forces* 72: 691-724.
- McPherson, Miller, Lynn Smith-Lovin, and James C. Cook, 2001, "Birds of a Feather: Homophily in Social Network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 415-44.
- Portes, Alejandro, and Robert D. Manning, 1986, "The Immigrant Enclave: Theory and Empirical Examples." Pp. 47-68 in *Competitive Ethnic Relations*, edited by Susan Olzak and Joanne Nagel.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Portes, Alejandro, and M Zhou, 1993,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30: 74-96.
- Roemer, John E., 1982,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chermerhorn, R. A., 1970, *Comparative Ethnic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Sorensen, Aage, 2001, "The Basic Concepts of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Class, Status, and Power." Pp. 287-302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David B. Grusk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Tam, Tony. 2004. "Cognitive Achievement as Competitive Status: A New Metric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教育階層化與家庭」小型研討會. 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Tsai, Shu-Ling, 2005. "Education, Language Skills, and Labor Force Outcomes: Models and Evidence for Taiwan," in *The Conference of 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RC28)*. University of Oslo, Norway.

Tsai, Shu-Ling, and Hei-Yuan Chiu, 1993,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aiwan: Comparison of Ethnic Groups." Proceedings of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OC 3: 188-202.

Tseng, Yen-fen, 1997, "Ethnic Resources as Forms of Social Capital." *Taiwenses Sociological Review* 1: 169-205.

Turner, Ralph H., 1960, "Sponsored and Contest Mobility and the School Syst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 855-866.

Useem, Michael, 1984, *The Inner Circle: Large Corporations and the Rise of Business Political Activity in the U.S. And U.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F.D., 2003, "Ethnic Niching and Metropolitan Labor Market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2: 429-466.
- Wilson, Kenneth, 1978, "Toward an Improved Explanation of Income Attainment: Recalibrating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 684-697.
- Xie, Yu, and Kimberly Goyetteb, 2003, "Social Mobility and the Educational Choices of Asian American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2: 467-498.
- Yu, Wei-hsin, and Kuo-hsien Su, 2004, "On One's Own: Self-Employment Activity in Taiwan." Pp. 388-425 in *The Reemergence of Self-Employment Activ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lf-Employment Dynamics and Social Inequality*, edited by Richard Arum and Walter Mull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Zimmer, Zachary, Linda G. Martin, and Hui-Sheng Lin, 2005, "Determinants of Old-Age Mortality in Taiwan."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0: 457-470.